

達例與特筆： 呂大圭《春秋五論》、《春秋或問》的解經方法*

康凱淋**

輔仁大學中國文學系

摘 要

本文分析呂大圭（1227-1275）將《春秋》筆法重新論斷為達例之常辭、特筆之變文，原本類例中的差異性變成了普遍性，循此通往《春秋》世變之遷流。另外又從普遍性中檢選出特殊性，天理義蘊就是從特殊性之書法彰顯而生，印證孔子從《春秋》建立是非善惡之公理，明正天理人心之綱紀。這套解經方法能延續朱熹（1130-1200）《春秋》說的基本精神，另立達例、特筆之調劑以糅合各派學說，明顯具備會通眾說、參稽諸家的特色，實踐南宋會通諸家之學；在踵繼紹承之上又別闢蹊徑，彌縫擴充成更完整的詮釋體系，形成元代《春秋》學折衷歸一的先驅。

關鍵詞：呂大圭，朱熹，《春秋》，理欲，世變

* 本文初稿曾以「呂大圭《春秋》學對朱熹的繼承與發明」為題，宣讀於「2018 經學與文化全國學術研討會」（臺中：國立中興大學，2018 年 12 月 7 日），承蒙蔡妙真教授審閱指正；論文投稿期間，兩位審查委員亦提供寶貴的修改意見，以及編輯人員細心校訂，使本文論述臻於完備，在此一併致謝。

** 輔仁大學中國文學系兼任助理教授，電子郵件信箱：095666@gapp.fju.edu.tw

一、前言：問題的提出

呂大圭 (1227-1275)，字圭叔，南安（今福建泉州）人，南宋理宗淳祐七年 (1247) 進士。納蘭性德 (1655-1685) 述其學門源流：「圭叔少嗜學，師事鄉先生潛軒王昭。昭為北溪陳淳弟子，淳受業晦庵稱高足。淵源之來，人稱溫陵截派。」¹ 謂呂大圭上承朱熹 (1130-1200)、陳淳 (1159-1223)、王昭（生卒年不詳）。另外，《宋元學案》又曰：「楊昭復弟子也。昭復之學，得之北溪陳氏，以接朱子。」² 可見呂大圭為朱熹門人，兼習王昭、楊昭復（生卒年不詳）之學。仕宦累官袁州、福州通判、朝散大夫、尚書吏部員外郎、國子編修實錄檢討官、崇政殿說書。又曾出知興化軍，常以俸錢濟貧。德祐初期轉知漳州，逢元兵行至沿海，蒲壽庚 (1205-1290) 時任都制置使，舉全州兵民投降，命呂大圭署寫降箋，呂大圭抗節不從，變服遁逃至海島避難，仍遭蒲壽庚殺害。門人丘葵 (1244-1332) 譽其行誼：「致身事君，舍生取義。所學所守，於公奚愧！」³ 清代四庫館臣亦贊之：「立身本末，皎然千古，可謂深知《春秋》之義。」⁴ 各家無不稱許呂大圭知行合一的處世精神。⁵

南宋寶祐二年 (1254)，何夢申（生卒年不詳）〈春秋或問跋〉提到呂大圭三部《春秋》學著作：「有《五論》以開其端，有《集說》以詳其義，又有《或問》以極其辨難之指歸，而《春秋》之旨明白矣。」⁶ 今存《春秋五論》、《春秋或問》，二者多一併刊行，唯《春秋集傳》已佚。整體學術主張如何夢申所概括：「蓋本文公之說而發明之。……噫！夫子之心，至文公而明；文公之論，至先生而備。」⁷ 呂大圭《春秋》學與朱熹的關係甚為密切。

¹ 納蘭性德著，尹小林主編，《納蘭文·霞蔚》，《納蘭性德全集》第 5 冊（北京：國際文化出版，2016），卷 12，〈春秋五論序〉，頁 134。

² 黃宗羲原著，全祖望補修，陳金生、梁運華點校，《宋元學案》第 3 冊（北京：中華書局，1986），卷 68，〈北溪學案〉，頁 2240。

³ 李清馥，《閩中理學淵源考》，《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史部第 460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卷 33，〈侍郎呂樸鄉先生大圭〉，頁 437。

⁴ 紀昀等，《欽定四庫全書總目》上冊（北京：中華書局，1997），卷 27，〈經部二十七·春秋類二〉，頁 353。

⁵ 納蘭性德亦評價呂大圭：「圭叔獨不為詭隨，甘走海島，不憚以身膏斧鉞，大節何凜凜也。」納蘭性德，《納蘭文·霞蔚》，卷 12，〈春秋五論序〉，頁 134。

⁶ 呂大圭著，趙宗乙點校，《春秋或問》（北京：商務印書館，2017），頁 211。

⁷ 同前引。

在宋代《春秋》學中，依傍《公》、《穀》，爭論褒貶，臧否義例是學術主流，⁸但朱熹不專主這條路線，⁹視一字褒貶為穿鑿、細碎、屑屑：「聖人亦只因國史所載而錄之耳。聖人光明正大，不應以一二字加褒貶於人。若如此屑屑求之，恐非聖人之本意」、「或有解《春秋》者，專以日月為褒貶，書時月則以為貶，書日則以為褒，穿鑿得全無義理」。¹⁰當代學人對此也多有共識，¹¹檢閱《朱子語類》確實有許多言辭內容可證。而呂大圭承襲朱熹，在《春秋五論》同樣點出日月、名稱、爵號褒貶的弊病：

六經之不明，諸儒穿鑿害之也，而《春秋》為尤甚。《春秋》穿鑿之患，其原起於三傳，而後之諸儒又從而羽翼之，橫生意見，巧出義理。……然其大端，不過有二：一曰「以日月為褒貶」之說，二曰「以名稱、爵號為褒貶」之說。¹²

學者必欲於名稱、爵號之間而求聖人褒貶之意，則窒礙而不通矣。於其不通也，而強為之說，則務為新巧，何所不至？甚非聖人明白正大之心爾。學者之觀《春秋》，必先破《春秋》「以日月為例」之說，與夫「以名稱、爵號為褒貶」之說，而後《春秋》之旨可得而論矣。¹³

呂大圭不否定《春秋》有褒貶，只是「《春秋》據事為褒貶之，實非以人、爵為褒貶之例」，¹⁴舉凡以日月、名稱、爵號為褒貶之說皆屬穿鑿橫生、務為新巧，故於《春秋或問》多次高舉「據事直書而善惡自見」的觀點。例如《春秋》隱公二

⁸ 張高評，《春秋書法與左傳史筆》（臺北：里仁書局，2011），頁378。

⁹ 朱熹不反對《春秋》有例，只是這凡例乃從魯史而來，並非孔子增易。「或論及《春秋》之凡例。先生曰：『《春秋》之有例固矣，奈何非夫子之為也。』」朱熹撰，朱傑人等主編，《朱子語類（四）》，《朱子全書》第17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卷83，〈春秋〉，頁2835。

¹⁰ 同前引，頁2836、2834。

¹¹ 如蔡方鹿就提到：「朱熹既明《春秋》大義，又指出並非一字一辭皆有褒貶之意，反對對《春秋》的穿鑿附會。」趙伯雄也主張：「朱子《春秋》觀的一個顯著的特色，就是他反對自來《春秋》學者所津津樂道的『一字褒貶』說。……對傳統《春秋》學中的所謂『義例』，朱子也大不以為然。」蔡方鹿，《朱熹經學與中國經學》（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頁463；趙伯雄，《春秋學史》（濟南：山東教育出版社，2004），頁484、486。

¹² 呂大圭，《春秋或問》，《春秋五論》，〈論二〉，頁215。

¹³ 同前引，頁218。

¹⁴ 同前引，卷12，〈僖公三十三年〉，頁143。

年：「鄭人伐衛。」《或問》記載：

或問：《春秋》書「侵」、「伐」、「圍」、「入」、「滅」、「取」之異，亦有意乎？曰：聖人各據其實而書之，而輕重自見矣。……愚謂入春秋之初，書殺弟自鄭莊始，書伐國亦自鄭莊始。莊之於段也，養之以成其惡而殺之矣，其子奔於他邦以餬其口，而又加兵於衛以責之，莊之所為，不已甚邪！當是時也，王政不行，伯圖未起，而鄭莊實以姦詐詭譎之雄，肆行其間。此一役也，專伐國，則有以見無王之罪焉；討公孫滑，則有以見殺弟不怠之怒焉，一書而二罪具矣。¹⁵

「據事直書而善惡自見」是朱熹一貫的主張，¹⁶ 認為麟經「注重直筆表述，據實呈露，筆不旋繞，而美惡自見」，¹⁷ 不必字字有大義。作為朱熹的三傳弟子，呂大圭也力主「據事直書而善惡自見」的路線，所以像經文記載「鄭人伐衛」的征伐語辭，讀者既可端見鄭莊公肆行專伐、無王之罪，又可見其追殺親弟、不怠之怒，聖人據實書之而二罪兼備。

就經典內在的體用模式來說，各家當然能選擇不同的切入角度，但朱熹「據事直書而善惡自見」這套理路究竟要如何通往《春秋》大義反而是一問題。張立恩就觀察道：「朱子基於其『聖人』觀念而破前儒文辭褒貶與史例褒貶之說，並通過吸收左氏家說及據實直書方法而提出以史視《春秋》說，但後者在重建聖人之意與經義關聯的問題上卻困難重重。」¹⁸ 認為朱熹的主張難以建構麟經大義。劉德明更具體分析朱熹《春秋》觀的侷限：

朱熹雖也認為《春秋》中有褒貶，但由於他反對書例，故只能透過「善惡自著」的讀史方式來理解《春秋》。職是之故，朱熹一來無法將《春秋》文句與大義間的做緊密的連結，二來《春秋》在史的價值上也可能

¹⁵ 同前引，卷2，頁22。

¹⁶ 例如：「聖人作《春秋》，不過直書其事，美惡人自見」、「不過如今之史書直書其事，善者惡者了然在目，觀之者知所懲勸，故亂臣賊子有所畏懼而不犯耳」。朱熹，《朱子語類（五）》，《朱子全書》第18冊，卷133，〈本朝七〉，頁4163；《朱子語類（二）》，《朱子全書》第15冊，卷55，〈孟子五〉，頁1804。

¹⁷ 張高評，《春秋書法與左傳學史》（臺北：五南圖書，2002），頁18。

¹⁸ 張立恩，〈《春秋》是實錄嗎？——朱子以史視《春秋》說之理論困境及元儒之解決方案〉，《北京社會科學》，2（北京：2018），頁120。

遠落在記事詳密的《左傳》之後。所以朱子在諸經之中獨對於《春秋》的內容發揮最少，甚至直言「某實看不得」也「常勸人不必做此經，他經皆可做，何必去做《春秋》？」朱熹之所以如此主張，實與朱子對《春秋》中的書例問題無法有合理的解決緊密相關，但這也讓《春秋》一書陷於可有可無的絕境。¹⁹

同樣提到「據事直書而善惡自見」會讓《春秋》義、法出現斷層，更易影響《春秋》經的經典地位；再加上朱熹又沒有《春秋》經傳的詮解，自然造成閱讀上的困惑，如同讀者雖有解經鎖匙，卻不得入其門戶。而呂大圭若僅僅步趨朱熹的基本路線勢必會面臨相同質疑，他有必要更進一步連結《春秋》文句和聖人大義的關係，無法盡以「據事直書而善惡自見」通貫全經。所以上述聖人據實，書「鄭人伐衛」以見二罪固然可為一說，但仍無法迴避為何會有「鄭」伐某、「鄭伯」伐某、「鄭人」伐某的語詞差異，更不可能像朱熹多持推測或保留的態度而已。²⁰ 換言之，呂大圭既已反對日月、名稱、爵號褒貶，那麼該如何看待這些紛歧不一的稱謂書法？在破立去取之間的安排又有哪些內容？此其一。

第二，檢視呂大圭《春秋》學的研究概況，成果多散見於《春秋》學史，大致可理出兩條路線。首先，呈顯呂大圭相沿朱熹《春秋》說的學術主張。例如戴維《春秋學史》說：「力主《左傳》、《穀梁》，而深排《公羊》，特別是對日月褒貶之例，承朱子之說，持論較為平正。」²¹ 延續清代四庫館臣的觀察。²² 沈玉成、劉寧《春秋左傳學史稿》則進一步指出呂大圭反胡尊朱的學術宗旨：「朱熹反對從孫復到胡安國以來的一派學說，在相當程度上對學風起到了補偏救弊的作用。他的這些基本看法，又有門徒弟子的著作為之張目，張洽的《春秋集注》十一卷和

¹⁹ 劉德明，〈吳澄《春秋纂言》中的「屬辭比事」探析〉，《國文學報》，61（臺北：2017），頁117-118。

²⁰ 「《春秋》有書『天王』者，有書『王』者，此皆難曉。」「書『人』，恐只是微者。然朝非微者之禮，而有書『人』者，此類亦不可曉。」「吳、楚盟會不書王，恐是吳、楚當時雖自稱王於其國，至與諸侯盟會，則未必稱也。」「『遂以夫人姜氏至自齊』，恐是當時史官所書如此。蓋為如今魯史不存，無以知何者是舊文，何者是聖人筆削，怎見得聖人之意？」朱熹，《朱子語類（四）》，卷83，〈春秋〉，頁2833、2834、2858、2859。

²¹ 戴維，《春秋學史》（長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04），頁373。

²² 四庫館臣曰：「大旨于三傳之中，多主《左氏》、《穀梁》，而深排《公羊》，于何休《解詁》斥之尤力。」紀昀等，《欽定四庫全書總目》上冊，卷27，〈經部二十七·春秋類二〉，頁353。

呂大圭的《春秋或問》二十卷，主旨就在反胡尊朱。」²³ 其次，扣緊呂大圭的解經方法。例如宋鼎宗《春秋宋學發微》評述《春秋或問》議論橫肆，並以「據事直書而善惡自見」為其主軸。²⁴ 而趙伯雄《春秋學史》特別注意呂大圭歷史考察的研究取向：「他採用前人的說法，分為隱桓莊閔之《春秋》、僖文宣成之《春秋》、襄昭定哀之《春秋》。各個階段都自有其歷史發展的特點。這樣對《春秋》做歷史的考察，可以發現較之《春秋》大義更為深刻的東西，這就是歷史發展的走向與規律。」²⁵ 並表示此一角度比單純探求經義更加高明，肯定呂大圭以史解經的研究貢獻。

不論學者從哪一角度探討都具有參考價值，為後人研究提供一盞明燈。但也許受限於章節篇幅或主客重心等不一的因素，南宋呂大圭《春秋》學的議題仍停留於模糊隱微的面貌。比方呂大圭除了繼承朱子之說，是否也別闢蹊徑地再造與發明？「反胡尊朱」若是基本立場，具體的執行方法、特色、意義為何？經文書辭又該如何呈現歷史性的考察？這些問題都尚待辨析討論。因此本文以「達例與特筆：呂大圭《春秋五論》、《春秋或問》的解經方法」為題，一方面增補學界研究，一方面也試圖拉大學術視野，定位呂大圭《春秋》學的詮說特色及時代意義。

二、達例：《春秋》「觀世變」的認識門徑

呂大圭《春秋五論》曰：「有《春秋》之達例，有聖人之特筆。」又云：「若夫名稱、爵號之異同，則有以事之大小，而其辭因之以詳略者，亦有前日而後月者，有蒙上文而殺其辭者，固難以一例盡。而時變之升降，世道之盛衰，亦有因之以見者。」²⁶ 劃分經文書法為二：「達例」、「特筆」。「達例」屬於史之舊文，名稱爵號僅是「詳辭」、「略辭」的不同。例如《春秋》昭公十二年：「晉伐鮮虞。」《左傳》記載晉國荀吳假裝欲會合齊軍，遂向鮮虞借路，乘機進入鮮虞屬國鼓之都城。²⁷ 許多宋代學者都採名爵褒貶，²⁸ 而呂大圭反對「狄之」的說法：

²³ 沈玉成、劉寧，《春秋左傳學史稿》（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2），頁232。

²⁴ 宋鼎宗，《春秋宋學發微》（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86），頁108。

²⁵ 趙伯雄，《春秋學史》，頁562。

²⁶ 呂大圭，《春秋或問》，《春秋五論》，〈論三〉，頁218；〈論二〉，頁217。

²⁷ 杜預注，孔穎達等正義，《春秋左傳正義》，《重刊宋本十三經注疏附校勘記》第6冊（臺北：藝文印書館，1982），卷45，頁790。

²⁸ 例如孫復（992-1057）批評晉國與楚國交伐中國，是夷狄之道，故夷狄稱之。胡安國（1074-1138）

案《春秋》，文十年秦伐晉、成三年鄭伐許、昭十二年晉伐鮮虞，先儒皆曰「狄之」也。……以愚觀之，是皆深於求《春秋》者也。嘗竊以為事有小大，辭有詳略。其書人、書氏、書爵者，詳辭也。其直書國者，略辭也。秦、晉之爭，自令狐而後，其事微矣，故略之。晉伐鮮虞亦然。《春秋》固不可盡以闕文視之，而亦豈可字字而求其義乎？²⁹

經文依魯史所記，但記事有近遠、小大、詳略的差異，不可全部等同視之。詳辭書人、書氏、書爵，略辭則直書國，所謂「事有小大，則記有詳略，史家常法」，³⁰故名氏爵號並非褒貶之所繫；後又載錄呂本中（1084-1145）的意見，舉出「其事則微，故其書亦略。晉伐鮮虞，略辭也，其罪則自見矣」，³¹強化觀點。

又如《春秋》莊公三十年「齊人伐山戎」，《春秋或問》逐次羅列劉敞（1019-1068）、胡安國等學者貶而稱人的說法，認為這類說法皆屬「牴牾」，進而主張：

愚謂經凡稱人者，皆略辭。用兵而非有大役者，皆稱人。……然則伐山戎為將卑師少，來獻捷為齊侯親往，亦何害乎？稱人者，其辭輕；稱爵者，其辭重。將卑師少，則其辭輕；齊侯親往，則其辭重。此自制言之體耳，何必多為之說哉？³²

將卑師少則稱人，事輕故辭略；齊侯親往則稱爵，事重故辭詳。舉凡經文書日、月、名、爵、盟、會、卒、葬、戰、伐、弑、殺等書詞，「一因其實事而吾無加損焉，此達例也」，³³並非為了褒貶而改易經文，屬於詳略、輕重之「達例」。所以像《春秋》隱公五年「衛師入郕」，呂大圭亦曰：「或問：書『戰』、『圍』、

也贊同孫復，抨擊晉國失信棄義，《春秋》制治未亂，拔本塞源，故書「晉伐鮮虞」，狄之也。陳傅良（1137-1203）亦主張「晉無中國之志也，於是狄晉」。孫復，《春秋尊王發微》，收入徐乾學輯，納蘭成德校訂，《通志堂經解》第19冊（臺北：漢京文化，1985），卷10，頁10910；胡安國著，錢偉彊點校，《春秋胡氏傳》（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0），卷24，〈昭公上〉，頁408；陳傅良，《春秋後傳》，收入徐乾學輯，納蘭成德校訂，《通志堂經解》第21冊，卷10，頁12204。

²⁹ 呂大圭，《春秋或問》，卷16，〈成公三年〉，頁180。

³⁰ 同前引。

³¹ 同前引。

³² 同前引，卷10，頁109。

³³ 同前引，《春秋五論》，〈論三〉，頁218。

『侵』、『伐』、『入』、『滅』，或稱人，或稱師，或稱某帥師，或稱君，何也？曰：稱人，略辭也；稱師、稱將、稱某帥師、稱君，詳辭也。」³⁴ 所有稱號都是史法詳略的不同，箇中沒有經義，就不需要由褒貶進入。

姚際恆 (1647-c. 1715) 〈春秋論旨〉曾云：「自有例之一字，而褒貶之說因以興焉。」³⁵ 對於主一字褒貶的學者而言，「類例」是一項重要的切入核心，麟經所有行文都先置入類例系統，類聚相同語式的事辭之後，再從中擇取互異的字詞以揭示讚揚、指責、重視、批評、厭惡等意向，³⁶ 所以這套操作過程有其機械、固定的制式化，更易造成牽強附會、膠葛難通等過度詮釋的問題。朱熹否定名爵稱號的類例褒貶，從「據事直書而善惡自見」揮去一字褒貶帶來的障蔽，但孔子《春秋》畢竟與魯《春秋》有別，《春秋》中的史文書法是否有基本的組織、規則、典式可循？倘若任何史事都不是獨立單一地存在，讀者又該如何統繫、連類、比綴錯綜複雜的史事記錄？這都是朱熹較少著墨的內容，以至於「據事直書而善惡自見」僅能導向讀者自行領悟麟經的文本意義，缺少了與聖人之意的具體聯繫。³⁷

呂大圭基於朱熹觀點，將史文書法的規則細緻化、標準化，積極將據事直書的史筆化分為詳略、輕重之書辭，³⁸ 除了能彌縫朱熹主張的侷限，更可直攻一字褒貶的核心思維。因為在實際狀況中，《春秋》確實有同類相應的記事原則，同樣性質的事件會有一般性、規律性的記錄辭序，³⁹ 但這原則又非一普遍性，事、辭之間仍有例外，主張一字褒貶者就從中歸納出正例、變例，由例見義。呂大圭當然也會面對許多「事同而辭不同」的書法，但他依舊選擇類聚相同語式的事辭，重新改

³⁴ 同前引，卷 3，頁 29-30。

³⁵ 姚際恆，《春秋通論》，收入林慶彰主編，《姚際恆著作集》第 4 冊（臺北：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1994），頁 2。

³⁶ 弗朗索瓦·于連 (François Jullien) 著，杜小真譯，《迂迴與進入》（北京：三聯書店，1998），頁 92。

³⁷ 張立恩，〈《春秋》是實錄嗎？——朱子以史視《春秋》說之理論困境及元儒之解決方案〉，頁 118。

³⁸ 以征伐書「人」來說，呂大圭仔細分述不同狀況下的詳、略之別：「以專權之大夫與未專權之大夫對言，則書專權之大夫為詳辭，而書人為略辭。以小國之大夫有故而後書其名，則其書名為詳辭，而書人為略辭。以夷狄之大夫浸交於中國而後書大夫，則書大夫為詳辭，而書人為略。以諸侯有大征伐而後詳其大夫之名氏，則有故而詳之為詳辭，而書人為略。故有以小國而略之，有以夷狄而略之，以君對大夫則略大夫，以大夫對微者則略微者，以關於盛衰者詳之，則不足為輕重者略之，凡此皆書人之義。」可見其區分歸類的用心，但亦流於瑣碎毛舉之失。呂大圭，《春秋或問》，卷 3，〈隱公五年〉，頁 30。

³⁹ 劉國民，〈論《公羊傳》對《春秋》的解釋〉，《湖北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3（武漢：2005），頁 338-341。

造類例舊有的識讀方法，打破正例變例的框架，將原有書法之正、變／同、異，化分為書法之詳、略／輕、重，所以書辭就不再是絕對的一分為二，而是蘊含更多的彈性空間；記錄的事件不再是截然「相同」的性質，而是因時制宜的「相似」，原本類例中的「差異性」即可變成「普遍性」，形成因其事實而無加損的達例系統。

換言之，全部經文的辭語和辭序之間仍相互牽連，包羅成一個完整而不可分割的共同體，書辭僅是詳略、輕重、小大的層次落差，讀者沒必要單獨檢選日月、名氏、爵號的字辭差異討論褒貶，應跳脫文法辭例的糾結，回歸到從「史文」見「史事」，再由「史事」觀「史勢」的操作模式，也就是按照朱熹提出的：「《春秋》只是直載當時之事，要見當時治亂興衰」，並以讀《春秋》「只如看史樣看」、「且當看史功夫」，⁴⁰ 所以讀者宜將目光拉遠，通貫前後、綴合上下，將達例與所有經文辭語共同集成「觀世變」的門徑，呼應前文呂大圭所自言的：「時變之升降，世道之盛衰，亦有因之以見者」。

呂大圭《春秋五論》主張「觀世變」之法：「所謂世變者，何也？春秋之始，是世道之一變也；春秋之終，是世道之一變也。」⁴¹ 將《春秋》始終分作隱桓莊閔、僖文宣成、襄昭定哀三個階段，⁴² 從經文勾勒歷史時勢之遞變。例如隱桓時期的《春秋》多書「王」，但僖文以後書「王」者極寡，表示伯主興而王迹熄；襄公之後主盟者皆為晉、楚，但昭公十三年平丘同盟之後，晉國不再主盟，經文多以「參盟」書，意指華夏伯業不競而夷狄熾交於中國，循此體察「王道存滅」和「伯統盛衰」的世變歷程。⁴³ 即使是類聚相同語式的事辭，但明顯與傳統類例褒貶關注在書「天王」、書「王」的差異，或是盟會何以書「伯」、書「人」、書「子」已有不同。

其他像「大夫據權」也是世變之勢，呂大圭曾比較隱桓莊閔和僖文宣成前後經文書「大夫帥師」的比例多寡，謂僖、文之際是一時代樞紐，形成大夫專權的演變

⁴⁰ 朱熹，《朱子語類（四）》，卷 83，〈春秋〉，頁 2832、2936；《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四）》，《朱子全書》第 23 冊，卷 60，〈答潘子善九〉，頁 2920。

⁴¹ 呂大圭，《春秋或問》，《春秋五論》，〈論四〉，頁 220。

⁴² 「所謂世變者，何也？春秋之始，是世道之一變也；春秋之終，是世道之一變也。……合《春秋》一經觀之，則有所謂隱、桓、莊、閔之春秋，有所謂僖、文、宣、成之春秋，有所謂襄、昭、定、哀之春秋。」同前引，頁 220-221。

⁴³ 「伯主之未興，諸侯無所統也，而天下猶知有王。故隱、桓之春秋，各書王。伯主之既興，諸侯有所統也，而天下始不知有王。故僖文以後之春秋，其書王者極寡。伯主之興，固世道之一幸，而王迹之熄，獨非世道之衰邪？……觀隱、桓、莊、閔之春秋，固已傷王迹之熄；觀襄、昭、定、哀之春秋，尤以傷伯業之衰。」同前引，頁 221。

局勢，⁴⁴ 並非纏繞於大夫列為經文帥師主語的褒貶問題。對宣公二年經文：「宋華元帥師及鄭公子歸生帥師，戰于大棘。」《或問》發義：

《春秋》書「戰」，未有書大夫帥師而戰者。書「大夫帥師」，自此始。自是而後，戰皆書「大夫」，故宋華元，鄭公子歸生，晉荀林父，衛孫良夫，魯季孫行父、臧孫許、叔孫僑如、公孫嬰齊，晉趙鞅，鄭罕達，齊國書，凡皆大夫帥師而戰也。……大夫之強，可知矣。⁴⁵

從經文始書「大夫帥師」即可知文公之後大夫逐漸主導國政，⁴⁶ 若再集中於「大夫帥師而戰」更能彰顯自宣公開始大夫越趨強盛、勢不可遏的狀況。其他像《春秋》大夫本不書名字，後亦載記名氏；或是諸侯本相盟，變成大夫與諸侯盟，再到大夫自相盟，都是諸侯僭天子，漸至大夫僭諸侯，終淪為陪臣竊大夫的世變梗概。⁴⁷ 讀者應類聚這些據事直書的「達例」系統看出世變史勢，而非圍繞於大夫的名爵稱號討論筆削褒貶之義，若以夷狄爵號來看也是如此。

《春秋》文公九年：「楚子使椒來聘。」一般多以聖人予楚慕義而進之曰「楚子」，⁴⁸ 但呂大圭《或問》則曰：

《春秋》書夷狄使人來聘四。此年及十二年「秦伯使術」，襄二十九年「吳子使札」、三十年「楚子使薳罷來聘」，皆非美其能聘也，所以著其強也。……蓋向也書荊人，則未有君、大夫也；繼也書「子」、書「伯」、書「使」，則有君也；書名，則有大夫也，然猶不氏也，蓋至於薳罷，則書氏矣。是夷狄之浸強也。⁴⁹

⁴⁴ 「然自僖以前書『帥師』者九，自文公而後書『帥師』者百有八焉，世之相去略同，而帥師之多寡不侔若是。蓋其始也，大夫之專權猶寡，其終也，則視以為常矣。」同前引，卷 2，〈隱公二年〉，頁 18。

⁴⁵ 同前引，卷 15，頁 166。

⁴⁶ 「伐書大夫主名者，自晉陽處父始；入書大夫主名，自卻缺始；侵書大夫主名，自趙穿始。是故《春秋》自文公以後，而大夫之名字始班班見之於經矣。」同前引，卷 2，〈隱公二年〉，頁 18。

⁴⁷ 同前引，《春秋五論》，〈論四〉，頁 221-222。

⁴⁸ 清代《欽定春秋傳說彙纂》案語即曰：「楚君書爵、楚臣書名，先儒皆謂《春秋》予其慕義。」王揆等奉敕撰，《欽定春秋傳說彙纂》，《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經部第 173 冊，卷 18，頁 511。

⁴⁹ 呂大圭，《春秋或問》，卷 14，頁 156。

類聚四條夷狄使人來聘之相同經文，關注面向不只有名爵稱法的達例，經文之「使」也是一判斷依據，所有辭語和辭序形成相互牽連的共同體。從隱桓莊閔時期夷狄書「荊人」而未有君與大夫，至僖文宣成書「子」、書「伯」、書「使」而有君與大夫，再到襄昭定哀使臣自大夫「書名不氏」變成大夫「書氏」，看出夷狄遞強日盛的局勢，循此通往《春秋》世變之遷流，更重要的是，「吳、楚浸盛而書『子』，秦伯崛起而書『伯』，皆著其實而已」，⁵⁰ 不必導向「以名爵、稱號為褒貶」的解經方法。

朱熹也強調看史要看其世變：「如《春秋》，聖人本意只是載那事，要見世變」、「精，是聖人本意；蘊，是偏旁帶來道理。如《春秋》，聖人本意，只是載那事，要見世變：『禮樂征伐，自諸侯出』，『臣弑其君，子弑其父』，如此而已」，⁵¹ 將「世變」作為理解《春秋》經義的基礎。⁵² 但朱熹自身未注解《春秋》經傳，「據事直書」如何結合「世變」還有待抉發，呂大圭就補強了「世變」與經文書記的關係，⁵³ 將《春秋》史筆「達例」之「常辭」作為「觀世變」的門徑。

值得注意的是，南宋不少《春秋》學家深受朱熹影響，像黃仲炎（生卒年不詳）作《春秋通說》，自言「遠稽孟子之書，近酌朱熹之論」，⁵⁴ 清代孫詒讓（1848-1908）評其書：「大旨宗朱子《春秋》無褒貶之說。」⁵⁵ 黃仲炎於序文雖亦抨擊三傳窮究類例褒貶造成《春秋》大義隱晦不清，⁵⁶ 但不會像呂大圭特別統合

⁵⁰ 同前引，卷 13，〈文公三年〉，頁 149。

⁵¹ 朱熹，《朱子語類（三）》，《朱子全書》第 16 冊，卷 66，〈易二〉，頁 2185；《朱子語類（四）》，卷 94，〈周子之書〉，頁 3170。

⁵² 許松源分析：「〔朱熹〕認為『世變』乃是理解《春秋》經義的基礎，《春秋》之旨與其褒貶之義，只有置於『世變』的脈絡當中才能凸顯其所關注的特定問題，以及經解上可行的取徑。」許松源，《經義與史論——王夫之《春秋》學研究》（新竹：國立清華大學歷史研究所博士論文，2008），頁 145。

⁵³ 雖然呂大圭在達例常辭上用力頗深，但《春秋或問》屬於問答類的形式，而《春秋五論》又偏向總論式的敘述，與傳統經解注疏的體例不同，因此論證分析的完整度並不高。目前《春秋或問》對達例分析最多的是戰爭征伐類的經文，至於其他類的書法如何套用到達例常辭，何種狀況下又各為詳、略的變化亦難掌握，讀者難以將某個判斷涵蓋至相關經文，所以在閱讀和處理有必要謹慎斟酌。

⁵⁴ 黃仲炎，《春秋通說》，收入徐乾學輯，納蘭成德校訂，《通志堂經解》第 23 冊，〈春秋通說表〉，頁 13084。

⁵⁵ 孫詒讓著，潘猛補點校，《溫州經籍志》第 1 冊（北京：中華書局，2011），卷 5，〈經部·春秋類〉，頁 216。

⁵⁶ 黃仲炎〈春秋通說原序〉記：「彼三傳者，不知其紀事皆以為戒也，而曰有褒貶焉；凡《春秋》書人書名，或去氏，或去族者，貶惡也。其書爵書字，或稱族，或稱氏者，褒善也。甚者如日月

相同語式的經文事辭，發揮世變律則的歷史解釋。例如《春秋》「王臣來聘」之經文，隱公九年：「天子使南季來聘。」黃仲炎曰：「當春秋之世，諸侯僭禮竊權，蔑視王室，縱不能討而反加聘問焉，以上諂下，亂之道也，故書。」⁵⁷ 顯現周室以上諂下的亂政之道。又如桓公四年：「天王使宰渠伯糾來聘。」《春秋通說》也敘述周桓王聘魯桓，實是寵篡逆以墮三綱，刑政既亡，⁵⁸ 所以王綱解紐、魁柄漸失全由經文所載而見，書其事即見其罪，足可作為後代鑑戒。⁵⁹ 反觀呂大圭《或問》討論王臣來聘：

王臣來聘者八：隱七年「凡伯」、九年「南季」，桓四年「宰渠伯糾」、五年「仍叔之子」、八年「家父」，莊二十三年「祭叔」，僖三十年「宰周公」，宣十年「王季子」。來聘凡八。桓王之聘於魯者五：自隱七年至桓八年家父之聘是也。在惠、襄、定之世，各一。自定以下，則王臣無下聘者矣。蓋桓王在位，不能自強，屢遣王臣下聘列國，此周室之所以衰也。定王而下則周室浸微，王臣之聘不足以為列國之輕重，而王臣下聘之文，亦不復見於經，此周室之極衰也。始也，使凡伯、宰渠伯糾之屬，皆以畿內諸侯或大夫來。至於僖三十年之聘，書「宰周公」，則已尊矣。至於宣十年之聘，書「王季子」，則益尊矣。王室日衰，諸侯日橫，顧如此哉！⁶⁰

比列桓王、惠王、襄王、定王使臣來聘的次數，勾勒「周室浸微」到「周室極衰」的世變過程，認為周室衰微的關鍵就是桓王聘魯。又從周定王之後，經文不再出現王臣下聘的記載以及周室使臣地位的變化，釐析「王室日衰」與「諸侯日橫」的強烈對比。參照《春秋通說》所述，黃仲炎雖如呂大圭，並未直從名爵氏族究論，卻

地名之或書或不書，則皆指曰是褒貶所繫也。質諸此而彼礙，證諸前而後違；或事同而名爵異書，或罪大而族氏不削，於是褒貶之例窮矣。例窮而無以通之則曲為之解焉，專門師授，襲陋仍訛，由漢以來，見謂明經者不勝眾多，然大抵爭辨於褒貶之異，究詰於類例之疑，滓重煙深，莫之澄掃，而《春秋》之大義隱矣。」黃仲炎，《春秋通說》，《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經部第156冊，頁291。

⁵⁷ 黃仲炎，《春秋通說》（漢京版），卷1，頁13096。

⁵⁸ 同前引，卷2，頁13104。

⁵⁹ 黃仲炎將《春秋》視為教、戒天下之書，所謂「戒」就是所書之事，以「事，衰亂之迹也，為戒而已矣。」黃仲炎，《春秋通說》（臺灣商務版），〈春秋通說原序〉，頁291。

⁶⁰ 呂大圭，《春秋或問》，卷12，〈僖公三十年〉，頁138。

不像他具有融入世變的闡釋手法。

黃震 (1213-?) 亦學從朱熹，為朱門傳人，⁶¹ 所著《黃氏日抄》援引朱熹之語，批評褒貶凡例穿鑿聖經：「今必謂其陰寓褒貶，使人測度而自知，如優戲之所謂隱者，已大不可，……以例求《春秋》，動皆逆詐億不信之心。」⁶² 黃震尤其重視孔子「明王法」，所以如《春秋》隱公七年：「天王使凡伯來聘。」他就反對諸儒責備天王下聘諸侯為非禮之論，而強調：「孔子作《春秋》，正以扶王室，豈有反責天王之理？」⁶³ 對隱公九年「天子使南季來聘」也是相同發義：「愚謂隨事實書而魯之罪自見，諸儒反以罪周者，過耳。夫《春秋》，固尊王之書也。」⁶⁴ 黃震雖然與呂大圭都繼承朱熹理念，但面對「王臣來聘」之事，一者側重「明王法」，一者傾向「觀世變」，各有後出轉精的新解與再造。

三、特筆：《春秋》「明大義」的路線重構

張大亨（生卒年不詳）曰：「《春秋》之為書也，文雖直而義深，事若簡而理盡。」⁶⁵ 《春秋》義理向來是歷代儒者圍繞的焦點，各從不同角度抉發聖人經旨，形成不斷演進的經典詮釋。姜廣輝分析宋儒的解經著作廣泛而頻繁地運用「天理」這項概念，使宋代經學帶有理學化經學的色彩，成為一種獨特的學術形態，⁶⁶ 這也直接影響《春秋》大義的認知與解釋。呂大圭《春秋五論》就開宗明義地提到《春秋》是扶天理、遏人欲之書：

《春秋》之作，何為乎？曰：《春秋》者，扶天理而遏人欲之書也。……孔子雖聖，不得位，則綏猷修道之責，誰實尸之？然而不忍絕也，於是以其明天理，正人心之責而自任焉。六經之書，皆所以垂世教

⁶¹ 歷來關於黃震是朱子第幾代傳人的說法不一，張偉研究黃震的師承關係，傾向全祖望之觀點，主張黃震是朱門四傳弟子。張偉，《黃震與東發學派》（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頁 42-45。

⁶² 黃震著，張偉、何忠禮主編，《黃氏日抄》，《黃震全集》第 1 冊（杭州：浙江大學出版社，2013），卷 7，〈讀《春秋》一〉，頁 157-158。

⁶³ 同前引，頁 171。

⁶⁴ 同前引，頁 174。

⁶⁵ 張大亨，《春秋通訓》，《叢書集成初編》第 3646 冊（北京：中華書局，1991），〈後敘〉，頁 119。

⁶⁶ 姜廣輝主編，《中國經學思想史（第三卷）》上冊（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0），頁 352-362。

也，而《春秋》一書，尤為深切。故曰：「我欲託之空言，不如載之行事之深切著明也。」魯史之所書，聖人亦書之，其事未嘗與魯史異也，而其義則異矣。魯史所書，其於君臣之義、上下之分或未辨也，而吾聖人則一正之。以君臣之義、上下之分、夷夏之辨有未明者，吾明之；長幼之序有未正者，吾正之；義利之無別也，吾別之；真偽之溷淆也，吾明之。其大要則主於扶天理於將萌，遏人欲於方熾而已。此正人心之道也。⁶⁷

《春秋》於六經當中最能體現聖人垂訓世教之意，因為聖人從魯史所書，端正政教失序、風俗隳壞，以及亂臣賊子恣睢熾結等人欲，建立君臣之義、上下之分、夷夏之辨、長幼之序、義利之別、真偽之明等天理。孔子綏猷修道，以明人心是非善惡之公理，不是只有賞善罰惡而已，《春秋》乃具有扶天理、遏人欲之功。

實際上早在南宋初期，胡安國《春秋胡氏傳》就已具備鮮明的理學氣息，其書序文申明：「周道衰微，乾綱解紐，亂臣賊子接跡當世，人欲肆而天理滅矣。……知孔子者謂此書遏人欲於橫流，存天理於既滅，為後世慮至深遠也。」⁶⁸《春秋》寓有百王法度、萬世繩準，學《春秋》者，「信窮理之要矣」，⁶⁹因此承襲程頤(1033-1107)貶斥春秋時期肆人欲、滅天理之亂事，另外探求《春秋》存天理、遏人欲之筆法，將「天理」融入經解，成為他《春秋》學的重要特點。⁷⁰其子湖湘學派創立者胡宏(1102-1261)也繼志述事，表達「天理人欲，莫明辨於《春秋》。聖人教人清人欲，復天理，莫深切於《春秋》」。⁷¹

⁶⁷ 呂大圭，《春秋或問》，《春秋五論》，〈論一〉，頁212。「其於君臣之義、上下之分或未辨也」一句係據頁224校記第1點所改。

⁶⁸ 胡安國，《春秋胡氏傳》，頁1。

⁶⁹ 同前引，頁2。

⁷⁰ 康凱淋提到：「胡安國基本上是發揮程頤說法，揭示春秋『肆人欲』、『滅天理』之亂事，雖非首將『天理人欲』引自經說，具體闡發『克治私欲』的實踐原則，但在連結仲尼『遏人欲』、『存天理』之筆法上，有更深切的經世之意。」學界也陸續關注胡《傳》的理學色彩，例如向世陵認為胡安國潛積三十餘年，闡明由北宋新儒學總結出來的天理人欲之辨的理學原則和存天理、正人心之術。戴維更主張其作是最系統完整地將《春秋》理學化，並完善發揮理學觀念的著述。康凱淋，《胡安國《春秋傳》研究》（臺北：致知學術出版社，2014），頁339-340；向世陵，《理氣性心之間——宋明理學的分系與四系》（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頁75；戴維，《春秋學史》，頁366。

⁷¹ 胡宏著，吳仁華點校，《胡宏集》（北京：中華書局，1987），〈一氣〉，頁28。

呂大圭此處的「理欲」主張同軌於胡安國，但其實兩人在建構「理欲」的路徑上有所不同。前文已提到呂大圭建立達例系統，據事直書中的書法只有詳略、近遠、輕重的差異，這都是經文常辭，所以「事同而辭不同」也是常法，不必拘守名爵褒貶。但其實在客觀的事實上，孔子《春秋》並非全依魯《春秋》，其中仍有筆削損益，不可能純以史法解經。呂大圭也認識到這一點，他說：「有史官之筆，有夫子之筆。史官之筆，謂其事也；夫子之筆，謂其義也。」⁷² 所以在「達例」之外還有聖人「特筆」，特筆是《春秋》變文，寓託經旨，達例、特筆相互搭配成讀經之法：「學者之觀《春秋》，必知孰為《春秋》之達例，孰為聖人之特筆，而後可觀《春秋》矣。抑愚嘗深惟《春秋》之義，竊以為其大旨有三：一曰明分義，二曰正名實，三曰著幾微。」⁷³ 因此「天理」已寓於《春秋》，具體落實為明分義、正名實、著幾微。其中明分義又包含明正朔、序君臣、別夷夏，以及明兄弟之義、父子之恩、長幼之序、嫡庶之別等綱常，「學《春秋》者，既能先明大義，以究理之精，又能次觀世變，以研事之實，則《春秋》一經亦思過半矣。」⁷⁴

例如《春秋》僖公五年：「晉侯殺其世子申生。」呂大圭從《左傳》記載太子自縊於新城一事，判斷經文書晉侯殺之是一特筆：「或問：傳載：世子『縊于新城』，而經直書『晉侯殺之』，奈何？曰：罪在晉侯也。凡殺世子、母弟，曰君。蓋世子、母弟之親，非君殺之則無能殺之者矣。獻公寵驪姬，則並后嬖奚齊，卓子則匹嫡也，亂本成矣。世子之殺，非他人也，晉侯而已矣。」⁷⁵ 謂稱君以殺是君之志，⁷⁶ 此特筆明父子之恩，統繫於「明分義」。⁷⁷

其他像《春秋》僖公十年：「晉里克弑其君卓及其大夫荀息。」按照達例常辭，諸侯即位踰年皆書君，雖遭殺害亦然，如文公十八年「齊人弑其君商人」、昭公十一年「楚子虔誘蔡侯般殺之于申」。⁷⁸ 但此年卓即位未踰年卻稱君，呂大圭《或問》先載錄胡安國之語：「〔里克〕是謂持祿容身，速獻公殺嫡立庶之禍者。故成其君臣之名，以正其弑逆之罪」，又援引劉敞所言：「〔里克〕患在於媿合苟

⁷² 呂大圭，《春秋或問》，卷1，〈春秋褒貶論〉，頁1。

⁷³ 同前引，《春秋五論》，〈論三〉，頁219。

⁷⁴ 同前引，〈論四〉，頁222。

⁷⁵ 同前引，卷11，頁123。

⁷⁶ 同前引，卷9，〈莊公二十二年〉，頁94。

⁷⁷ 同前引，《春秋五論》，〈論三〉，頁219。

⁷⁸ 「案經，諸侯雖篡弑，苟踰年則皆以成君稱之。齊商人，弑君者，及其見殺則稱君；蔡般，弑父者，及其被殺則稱侯。」同前引，卷5，〈桓公六年〉，頁55。

容逢君之惡，故《春秋》成其君臣之名，著其篡弑之罪也」，⁷⁹ 故聖人正卓之名為「君」，揭櫟里克弑君之罪，此亦聖人「正名實」。⁸⁰

又如聖人記載春秋初期，大夫帥師侵、伐、入、滅等書法的常辭皆稱「人」：「春秋之初，列國之大夫皆稱『人』」、「春秋之初，雖大國之大夫亦書人，不特小國為然也」、「君將稱君，大夫將稱人，《春秋》之常辭也」，⁸¹ 征伐書「人」是達例常辭，因此若以「大夫某」為將、「大夫某」帥師者都是聖人特書之變文，呈現大夫專權：「大夫將書大夫，《春秋》之變文也」、「蓋春秋之初，猶未有專權之大夫也，故征伐稱大夫者皆專也。其書將者，是專權之大夫也；其書某帥師者，是專權之大夫，而又用大眾也，凡此皆特書也」。⁸² 如《春秋》隱公十年：「翬帥師會齊人、鄭人伐宋。」此處直書「翬」會諸侯之師伐宋，以見公子翬擅權，闡釋「著幾微」之大義。⁸³

所以呂大圭雖與胡安國同樣彰顯天理，但他盡棄以日月為例、以名稱爵號為褒貶，在《春秋》普遍性的「史官之筆——常辭」中，檢選出特殊性的「夫子之筆——特筆」，「特筆」寓有聖人垂世教、正人心之旨，明分義、正名實、著幾微皆由特筆統繫於「天理」，讀《春秋》不可不察。⁸⁴ 而胡安國選擇將所有經文歸納為正例、變例組合成的類例，正例、變例都是夫子之筆，皆寓有窮理精義，讀者須於例中見法、例外通類，⁸⁵ 循一字褒貶理解聖人「存天理」之旨。呂大圭「特筆變文——理欲」已異於胡安國《春秋胡氏傳》「類例褒貶——理欲」的建構路線，這也是沈玉成、劉寧《春秋左傳學史稿》指稱的「反胡」，屬於解經方法的範疇。不過胡安國和呂大圭「存天理」內容仍皆與綱常倫理有關，⁸⁶ 呂大圭《春秋或

⁷⁹ 同前引，卷 11，頁 127、128。

⁸⁰ 同前引，《春秋五論》，〈論三〉，頁 219。

⁸¹ 同前引，卷 2，〈隱公二年〉，頁 18；卷 3，〈隱公五年〉，頁 30；卷 13，〈文公三年〉，頁 148。

⁸² 同前引，卷 13，〈文公三年〉，頁 148；卷 3，〈隱公五年〉，頁 30。

⁸³ 「所謂著幾微者，何也？……公會齊侯、鄭伯于中丘，翬帥師會齊人、鄭人伐宋，著公子翬之擅也。……凡此之類，皆所以著幾微。」同前引，《春秋五論》，〈論三〉，頁 219-220。

⁸⁴ 呂大圭認為學者觀《春秋》，「要必知有聖人之特筆，則夫分義之間、名實之辨、幾微之際，有關於理義之大者，不可不深察也。」同前引，頁 220。

⁸⁵ 「《春秋》之文，有事同則詞同者，後人因謂之例。然有事同而詞異，則其例變矣。是故正例非聖人莫能立，變例非聖人莫能裁；正例天地之常經，變例古今之通誼。惟窮理精義，於例中見法、例外通類者，斯得之矣。」胡安國，《春秋胡氏傳》，〈明類例〉，頁 11。

⁸⁶ 康凱淋已述及胡安國援用「天理人欲」的具體主張就是建立夫婦、父子、君臣等人倫關係，確定個體群體之名分。康凱淋，《胡安國《春秋傳》研究》，頁 340。

問》訂立「明分義」、「正名實」、「著幾微」，看似重組為一套新的體系，但其實質本質仍與胡安國相同，⁸⁷ 複合物裡的組合元素並非標新立異，只是別闢蹊徑，另將「特筆」作為一道新的調劑，端正君臣、父子、兄弟、長幼、嫡庶等綱常秩序，以通往「存天理、遏人欲」的體系。

必須補充的是，呂大圭將書法分為達例之常辭、特筆之變文，一以觀世變，一以明大義，看似能以簡馭繁，但實際解經過程又頗有疊床架屋之嫌。比方《春秋》僖公四年：「齊人執陳轅濤塗。」呂大圭除了判斷稱人為略辭，稱侯為重辭，在這之上又補充「稱人者，其文之常也；稱侯者，特變其文也」，⁸⁸ 會出現幾則變文：僖公二十一年「宋公、楚子、陳侯、蔡侯、鄭伯、許男、曹伯會于孟，執宋公以伐宋」、二十八年「晉侯入曹，執曹伯」、昭公八年「楚師滅陳，執陳公子招，放之于越」、十一年「楚師滅蔡，執蔡世子有以歸」，皆因與前句搭配而隸屬變文，和直書「某人執某」的用法不一。但既有常辭和變文的區別，呂大圭卻另又點出成公十五年「晉侯執曹伯歸于京師」是一特書：「不書『人』，而書『侯』，蓋《春秋》諸侯執人而得其道者。惟此一事而已，故特書之。」⁸⁹ 所以經文書「執」共有三種書法，雖不涉及褒貶，但也失於繁細。此其一。

第二，雖然呂大圭以《春秋》據事褒貶，但有些經解仍未跳脫傳統的討論範疇，也就是無法將「達例／常辭」與「特筆／變文」此原則通貫全書，易使讀者無所適從。例如《春秋》書「弑」，《或問》曰：「《春秋》書『弑君』之例：有出

⁸⁷ 實際上這些概念在先秦兩漢就已出現，透過漢、唐、宋歷代諸儒篩選、承襲、擴充、改造，是一道累積性的詮釋歷程。比方像「正名實」，最早在《莊子·天下》就有「《春秋》以道名分」一語；董仲舒（176 B.C.-104 B.C.）《春秋繁露》亦有「名實」、「分義」的觀點：「立義以明尊卑之分，強幹弱枝以明大小之職」（〈盟會要〉）、「強幹弱枝，大本小末，則君臣之分明矣。別嫌疑，異同類，則是非著矣」（〈十指〉）；歐陽修（1007-1072）也曾言：「孔子何為而修《春秋》？正名以定分，求情而責實，別是非，明善惡，此《春秋》之所以作也。」又以「著幾微」為例，《周易·坤卦·小象》已寓託辨早慎微的重要：「履霜堅冰，陰始凝也。馴致其道，至堅冰也。」北宋不少學者發揮謹微慎始之道，如司馬光（1019-1086）〈重微〉說明六項常見棄忽的徵兆，戒懼萬事之微；張耒（1054-1114）〈慎微篇〉也主張人君宜思患預防。王先謙撰，沈嘯寰點校，《莊子集解》（北京：中華書局，1987），卷 8，頁 288；蘇輿撰，鍾哲點校，《春秋繁露義證》（北京：中華書局，1992），卷 5，頁 141、146；歐陽修著，洪本健校箋，《歐陽修詩文集校箋》上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居士集》，卷 18，〈春秋論中〉，頁 549；王弼、韓康伯注，孔穎達等正義，《周易正義》，《重刊宋本十三經注疏附校勘記》第 1 冊，〈易一〉，頁 19；司馬光撰，李之亮箋注，《司馬溫公集編年箋注》第 3 冊（成都：巴蜀書社，2009），卷 19，頁 82；張耒，《柯山集·附拾遺（七）》，《叢書集成初編》第 1955 冊（北京：中華書局，1985），《柯山集拾遺》，卷 7，頁 675-679。

⁸⁸ 呂大圭，《春秋或問》，卷 11，頁 122。

⁸⁹ 同前引。

其主名者，則其罪專在一人；若其不出主名而稱國、稱人，則其罪不專在一人矣。稱國以弑者，則其大臣、貴戚咸有罪焉，……稱人以弑，則其國人咸有罪焉。」⁹⁰ 列舉「莒弑其君庶其」、「晉弑其君州蒲」、「宋人弑其君杵臼」等相關經文，從名號稱法討論歸罪對象，與歷來意見相同，顯然自相矛盾。⁹¹

第三，呂大圭僅反對「以日月為褒貶」與「以名稱、爵號為褒貶」，至於經文其他詞彙則不列入考量。所以像經文書「遂」，呂大圭認為《春秋》有書之以為譏者，例如「公子結媵婦，遂及齊、宋盟」、「公子遂受命如京，遂如晉」、「公孫歸父未復命，遂奔齊」、「仲孫蔑會于戚，遂城虎牢」等，聖人書「遂」譏其專。《春秋》亦有書「遂」以為美者，像是「齊桓帥諸侯之師以侵蔡，遂伐楚」、「楚人伐許，諸侯遂救許」，聖人予之。⁹² 但其實這解讀思維正與力主一字褒貶的學者雷同，⁹³ 所以呂大圭雖然秉持《春秋》「據事褒貶」，但仍不免導入「一字褒貶」的思考，正如程端學（1278-1334）所觀察的：「傑然欲埽陋習而未暇致詳也」。⁹⁴

四、呂大圭《春秋或問》解經方法的學術意義——元代《春秋》

學折衷歸一之先驅

晚清皮錫瑞（1850-1908）勾勒唐、宋《春秋》學之演變：

今世所傳合《三傳》為一書者，自唐陸淳《春秋纂例》始。淳本啖助、趙匡之說，雜采《三傳》，以意去取，合為一書，變專門為通學，是

⁹⁰ 同前引，卷 14，〈文公十六年〉，頁 161。

⁹¹ 又如呂大圭歸納《春秋》書「殺」，分為稱君以殺、稱國以殺、稱人以殺，殺之罪雖一卻有輕重之異。而稱人以殺代表眾殺，又細分為「有弑君之賊人，人得而討之，則稱人以殺者，討其罪之辭也」、「有國亂無政，眾人擅殺，令不出於君，而眾殺之者」，一樣未能跳脫傳統的稱號褒貶框架，並且亦流於繁細。同前引，卷 9，〈莊公二十二年〉，頁 94。

⁹² 同前引，頁 92。

⁹³ 例如《春秋》僖公四年：「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侵蔡。蔡潰，遂伐楚，次于陘。」胡《傳》曰：「書『遂伐楚』，譏其專也。」《春秋》僖公六年：「楚人圍許，諸侯遂救許。」胡《傳》曰：「其曰『遂救許』，善之尤者也。」胡安國，《春秋胡氏傳》，卷 11，〈僖公上〉，頁 151、156。

⁹⁴ 程端學，《春秋本義》，收入徐乾學輯，納蘭成德校訂，《通志堂經解》第 25 冊，〈春秋本義序〉，頁 13956。

《春秋》經學一大變。宋儒治《春秋》者，皆此一派。如孫復、孫覺、劉敞、崔子方、葉夢得、呂本中、胡安國、高閌、呂祖謙、張洽、程公說、呂大圭、家鉉翁，皆其著者。⁹⁵

宋儒依循唐代啖助 (724-770) 一派，選擇「雜采」三傳，以己意「去取」為解經方法，呂大圭也屬於其中的傳衍歷程。若純以大範圍的時代向度為比較標準，皮錫瑞的觀察無誤，兩宋《春秋》學確實帶有「會通」色彩，但如果更細緻地區分兩宋「會通」之學，可發現重心開始轉移，焦點已逐步向外擴展。

會通三傳的前提必須先釐清三傳得失優劣，所以北宋諸儒開始思考三傳各自的解經體例、方法與性質。依據姜義泰分析：

北宋學者提出的解經方法，皆是在中唐啖助學派提出的兼采三傳、擇善而從方式下進一步的深入發展。學者基於不同的立場，提出多元複雜的解經進路，並對三傳有所偏重。儘管學者解經時偏重某傳，然而此點並不意謂學者已如漢儒般尊崇家法，堅持依某傳解經。而是在兼采三傳的前提下各自依據不同解經立場，發展出對三傳內容的抉擇。⁹⁶

因此，省思三傳解說的側重，權衡經義闡釋的異同，試圖截長補短、補苴調膈是北宋時期的一大特色。而大約自哲宗時期始，三傳解經方法的具體取向逐步浮現，也有更多元複雜的思考。⁹⁷ 如樂圃先生朱長文 (1039-1098) 曾師從孫復學《春秋》，⁹⁸ 作《春秋通志》一書，成書方法是：「兼取三傳而折衷其是，旁考啖、趙、陸淳諸家之義，而推演明復之言，頗繫之以自得之說。」⁹⁹ 雜糅三傳是基本方式，前代儒者如啖助等人的說法也是參考來源之一。同時期的蘇轍 (1039-1112)

⁹⁵ 皮錫瑞著，周春健校注，《經學通論》（北京：華夏出版社，2011），卷5，〈論啖、趙、陸不守家法，未嘗無扶微學之功，宋儒治《春秋》者皆此一派〉，頁435。

⁹⁶ 姜義泰，《北宋《春秋》學的詮釋進路》（臺北：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博士論文，2013），頁464。

⁹⁷ 姜義泰指出：「起點介於劉敞之卒年（熙寧元年，1068）至朱長文元祐初（1086-1094）講學之際。其終點則至北宋末靖康二年（1127）為終止。此一時期在詮釋方法上，其特點即為開始提出如何運用三傳的解經方法，以及方法背後的複雜思考。」同前引，頁468。

⁹⁸ 「〔朱長文〕從泰山學《春秋》，得《發微》深旨。」黃宗羲，《宋元學案》第1冊，卷2，〈泰山學案〉，頁118。

⁹⁹ 朱長文撰，朱思輯，《樂圃餘藁》，《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集部第1119冊，卷7，〈春秋通志序〉，頁36。

亦有《春秋集解》，雖然是以《左傳》為主，但仍「參以公、穀、啖、趙」¹⁰⁰ 諸人之說。所以在會通的基本思路中，啖、趙、陸等諸家詮解也逐漸與三傳並立於會通的平臺，到了南宋時期，諸家詮解已不限於啖、趙、陸，反而擴及其他學者。

比方張洽 (1160-1237)《春秋集註》就主張：「凡二百四十二年之行事，與漢、唐以來諸儒之議論，莫不考覈研究，會其異同，而參其中否」；¹⁰¹ 程公說 (1171-1207)《春秋分記》也是事依《左傳》，「又旁采公、穀及諸子之說精且要者附正其下」；¹⁰² 家鉉翁 (1213-1295)《春秋集傳詳說》同樣兼採眾說，「三傳之是者取焉，否則參稽眾說而求其是」，¹⁰³ 不敢因人所長而毀之。如果北宋學者會通三傳而開始思考三傳優劣，那麼南宋學者會通諸家說解，自然也檢討諸家短長，但兩宋以意解經的普遍風氣已造成眾說滋蔓，以至於元代逐漸朝向折衷眾說以歸於一的學術主張。

吳澄 (1249-1333) 就感嘆宋儒之作各有所長，卻無法定於一尊：「偏觀宋代諸儒之書，始於孫劉，終於趙呂，其間各有所長，然而不能一也。……諸家異同，殆如聚訟。」肯定元儒敬鉉 (?-c. 1280)《明三傳例》能在「眾言淆亂之中，折衷以歸於一，是誠有補於後學」。¹⁰⁴ 郝經 (1223-1275) 抨擊學者私意太過，導致說解肆遠，例法繁亂，認為聖人「經天緯地，彰往察來，始終先後，本末原委，有一定不易之理，然後為一定不易之法，……所謂吾道一以貫之者，在夫是也」，¹⁰⁵ 所以上溯本原，順流而下，折衷眾說。而經傳注解能否折衷歸一也成為評價標準，如元代晚期許有壬 (1287-1364) 就肯定張君立 (生卒年不詳)《春秋集議》「擷眾長萃於一」。¹⁰⁶

如果將呂大圭《春秋或問》置於宋代兼採會通再到元代折衷歸一的詮釋歷程，本書也具備會通折衷的特色。比方呂大圭的解經方法雖然與胡安國不同，但許多經解仍收錄胡《傳》全文，尤其是與「據事直書而善惡自見」有關的內容。例如《春

¹⁰⁰ 蘇轍，《春秋集解》，《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經部第 148 冊，〈春秋集解引〉，頁 2。

¹⁰¹ 張洽，《春秋集註》，收入徐乾學輯，納蘭成德校訂，《通志堂經解》第 23 冊，〈繳《春秋集傳》等申臨江軍使衙狀〉，頁 13220。

¹⁰² 程公說，《春秋分記》，《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經部第 154 冊，〈春秋分記序〉，頁 4。

¹⁰³ 家鉉翁，《春秋集傳詳說》，收入徐乾學輯，納蘭成德校訂，《通志堂經解》第 24 冊，〈讀春秋序〉，頁 13511。

¹⁰⁴ 朱彝尊撰，林慶彰等主編，《經義考新校》第 7 冊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卷 193，〈春秋二十六〉，頁 3529。

¹⁰⁵ 郝經，《陵川集》，《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集部第 1192 冊，卷 28，〈春秋制作本原序〉，頁 303。

¹⁰⁶ 朱彝尊，《經義考新校》第 7 冊，卷 194，〈春秋二十七〉，頁 3562。

秋》文公十八年：「夫人姜氏歸于齊。」呂大圭《春秋或問》引胡《傳》：「胡氏曰：『書「夫人」，則知其正；書「姜氏」，則知其非見絕於先君；書「歸于齊」，則知其無罪，異於「孫于邾」者。而魯國臣子殺嫡立庶，敬嬴、宣公不能事主君，存嫡母，其罪不書而並見矣。』」¹⁰⁷ 胡《傳》此處側重直從經文見其善惡得失，符合呂大圭強調的：「大抵《春秋》據事為褒貶之，實非以人、爵為褒貶之例」，¹⁰⁸ 故《或問》載錄其文。

不過，《或問》某些地方援引胡《傳》會刻意刪除、改易與一字褒貶有關的用語。例如《春秋》莊公八年：「齊無知弑其君諸兒。」呂大圭《或問》援引胡《傳》內文，卻直接刪去「無知曷為不稱『公孫』而以國氏？罪僖公也」的觀點。¹⁰⁹ 又如《春秋》隱公七年：「齊侯使其弟年來聘。」此是列國來聘之始，呂大圭《春秋或問》與胡安國《春秋胡氏傳》的傳文如表一。

呂大圭謂《春秋》書諸侯來聘或稱「卿大夫」、或稱「弟」，皆為達例之常辭，聖人著其實而書。唯隱公七年「齊侯使其弟年來聘」、桓公三年「齊侯使其弟年來聘」、十四年「鄭伯使其弟語來盟」、成公十年「衛侯之弟黑背帥師侵鄭」為聖人特筆之變文，見諸侯厚寵愛之私；昭公二十年「盜殺衛侯之兄縶」、元年「秦伯之弟鍼出奔晉」、定公十年「宋公之弟辰暨仲佗、石彊出奔陳」亦是特筆，見諸侯薄友愛之義。若與胡《傳》相較，可發現呂大圭此處的特筆變文是參用胡安國說法而來，但明顯弱化一字褒貶，不僅不取「兄弟，先公之子，不稱『公子』，貶也」一句，也刪去「罪」、「責」、「貶」等用詞，所以胡《傳》「罪其有寵愛之私」、「責其薄友恭之義」在呂大圭《或問》就變成「見其厚寵愛之私」、「見其薄友愛之義」。不過呂大圭認同胡《傳》「存天理」之義，故逕取胡《傳》「仁人於兄弟，絕偏係之私，篤友恭之義，人倫正而天理存」之說，融入《或問》「達例」與「特筆」解經方法的系統。

¹⁰⁷ 呂大圭，《春秋或問》，卷 14，頁 162。

¹⁰⁸ 同前引，卷 12，〈僖公三十三年〉，頁 143。

¹⁰⁹ 同前引，卷 7，頁 80。胡《傳》原文：「無知曷為不稱『公孫』而以國氏？罪僖公也。弑君者無知，於僖公何罪乎？不以公孫之道待無知，使恃寵而當國也。按無知者，夷仲年之子。年者，僖公母弟也。私其同母，異於他弟，施及其子，衣服禮秩如嫡，此亂本也。故於年之來聘特以『弟』書，於無知之弑不稱『公孫』，著其有寵而當國也，垂戒之義明矣。古者親親與尊賢，並行而不相悖。故堯親九族，必先明俊德而後九族睦；周封同姓，必庸康叔、蔡仲而後王室強。徒知寵愛親屬，而不急於尊賢，使為儀表，以明親親之道，必有篡弑之禍矣。」胡安國，《春秋胡氏傳》，卷 7，〈莊公上〉，頁 95-96。

表一：胡安國、呂大圭詮解「齊侯使其弟年來聘」經文之異同

胡安國《春秋胡氏傳》	呂大圭《春秋或問》
兄弟，先公之子，不稱「公子」，貶也。<u>書「盟」、書「帥師」而稱兄弟者，罪其有寵愛之私。書「出奔」、書「歸」而稱兄弟者，責其薄友恭之義。</u>攷於事，而《春秋》之情可見矣。年者，齊僖公母弟也。程氏謂：「先儒說母弟者，蓋緣禮有立嫡子同母弟之文。其曰『同母』，蓋為嫡耳，非以為加親也。此義不明久矣。」僖公私於同母，寵愛異於他弟，施及其子，猶與嫡等，而襄公絀之，遂成篡弑之禍。<u>故聖人於年來聘特變文書「弟」，以示貶焉。</u>鄭語來盟，黑背帥師，皆罪其私也。《書》云：「于弟弗念天顯，乃弗克恭厥兄；兄亦不念鞠子哀，大不友于弟。天惟與我民彝大泯亂。」陳光奔楚而稱弟，「不念鞠子哀」矣；盜殺衛繫而稱兄，其亦「不念天顯」矣；秦鍼、宋辰，皆責其薄也。仁人於兄弟，絕偏係之私，篤友恭之義，人倫正而天理存，其《春秋》以訓天下與來世之意也。¹¹⁰	或問：諸侯之交聘也，禮乎？曰：諸侯之於天子也，比年小聘，三年大聘，所以致其恭；其於邦交也，歲相問也，殷相聘也，所以致其愛。諸侯之交相聘，禮也。雖然，春秋之時，朝聘不入京師，相與結驩繼好者，數大國而已，無復有慕賢、考禮、一法度、尊天王之實也。故雖玉帛交聘，修於邦交之常禮，而其實則諸侯橫恣，連衡自固，以相比周爾。故大國聘而不朝，小國朝而不聘。聘而不朝者，以其強而足以役弱也；朝而不聘者，以其弱而有以事強也。故或以卿大夫、或以弟，聖人皆著其實而書之。此年齊之來聘者，則將以結魯也，是私也；使其弟來，亦私也。然《春秋》書「兄弟」之例有二，<u>書盟、書帥師而稱「兄弟」者，有以見其厚寵愛之私；書出奔、書歸而稱「兄弟」者，有以見其薄友愛之義。</u>故此年「使其弟年來聘」，桓三年「使其弟年來聘」、「鄭伯使其弟語來盟」與夫「黑背帥師」之類，皆私也；盜殺衛繫，秦鍼、宋辰出奔，皆薄也。仁人之於兄弟也，絕偏係之私，篤友恭之義，人倫正而天理存矣。¹¹¹

所以呂大圭不是全然否定胡安國《春秋胡氏傳》，只是反對他的解經方法，不會抹滅他在麟經大義上的發揮，如同朱熹也肯定胡安國的學術成就：「聞道伊洛，志在《春秋》，著書立言，格君垂後，所以明天理，正人心，扶三綱，敘九法者，深切著明，體用該貫。」¹¹² 而我們若回到朱熹—呂大圭這條學術脈絡，固然朱熹不否認《春秋》存有天理，¹¹³ 但實質上並未在「《春秋》筆法」與「天理人欲」

¹¹⁰ 胡安國，《春秋胡氏傳》，卷2，〈隱公中〉，頁25-26。「僖公私『於』同母」係據頁28校勘記第19點所改。

¹¹¹ 呂大圭，《春秋或問》，卷4，頁35-36。

¹¹² 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五）》，《朱子全書》第24冊，卷77，〈建寧府崇安縣學二公祠記〉，頁3708。

¹¹³ 例如：「《六經》是三代以上之書，曾經聖人手，全是天理」、「愚見如此，而考之劉質夫說，亦云先書『春王正月』，而後書二百四十二年之事，皆天理也」。朱熹，《朱子語類（一）》，

的關係多加著墨，相形之下，呂大圭《春秋或問》反而從達例、特筆統攝胡《傳》觀點，自成一套章法理路。

其次，南宋《春秋》學並非只有呂大圭主張「觀世變」，永嘉學派陳傅良也強調「觀世變」，一樣分為隱桓莊閔、僖文宣成、襄昭定哀三階段，¹¹⁴ 勾勒從春秋初期諸侯始不尊周王，淪為伯者相競；再到春秋末期中國諸侯久無伯主，流於蠻夷爭勢的局面，提舉出「無王」至「無伯」的歷史解釋。¹¹⁵ 呂大圭「觀世變」明顯參考陳傅良盱衡歷史發展的模式。例如《春秋》隱公三年：「齊侯、鄭伯盟于石門。」呂大圭《或問》曰：

當是時，天下未有伯也，而世道之將趨於伯者，已不可遏矣。故嘗謂讀隱、桓之《春秋》，則知伯圖未興，而諸侯之莫相統一也；讀莊、閔、僖、文、宣、成之《春秋》，則知伯圖迭興，而諸侯尚猶有所總攝也；讀襄、昭、定、哀之《春秋》，則知伯圖寢衰，而中國諸侯莫適為主也。雖然，隱、桓之際，伯圖未興，而齊侯、鄭伯特雄長於其間，謂之東周之小伯。自石門之盟而齊、鄭始合，相為黨與以求伯諸侯，於是齊、鄭為一黨，魯、宋、衛、陳、蔡為一黨，二黨分而天下始多故矣。……陳氏曰：「書齊、鄭盟于石門，以志諸侯之合；書齊、鄭盟于鹹，以志諸侯之散，是《春秋》之始終也。」¹¹⁶

從石門之盟闡發春秋世道必導向伯主統領的局面，鉤稽「隱桓——伯圖未興」、「莊閔僖文宣成——伯圖迭興」、「襄昭定哀——伯圖寢衰」之始末，宏觀式的目光印合陳傅良所強調的：「《左傳》且熟讀，見得隱桓以前，僖文之際，哀定終

《朱子全書》第14冊，卷11，〈學五〉，頁347；《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三）》，《朱子全書》第22冊，卷43，〈答林擇之〉，頁1971。

¹¹⁴ 樓鑰（1137-1213）〈止齋春秋後傳左氏章指序〉概括陳傅良的解經特點：「深究經旨，詳閱世變，蓋有所謂隱、桓、莊、閔之《春秋》，有所謂僖、文、宣、成之《春秋》。有所謂襄、昭、定、哀之《春秋》。」樓鑰撰，顧大朋點校，《樓鑰集》第3冊（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0），卷48，頁897。

¹¹⁵ 「全書〔《春秋後傳》〕不斤斤於書例，而是重視對史實的分析、排比，例如把春秋魯國十二公分為三個時期，指出三個時期的特點，從猶知有天子到知霸而不知王，再到蠻夷之侵陵中原。」沈玉成、劉寧，《春秋左傳學史稿》，頁239-240。

¹¹⁶ 呂大圭，《春秋或問》，卷3，頁25。

篇，無慮三變綱目，則成書舉矣。」¹¹⁷ 引文除了在最後直接徵引陳傅良說法，中間「自石門之盟而齊、鄭始合，相為黨與以求伯諸侯，於是齊、鄭為一黨，魯、宋、衛、陳、蔡為一黨，二黨分而天下始多故矣」的觀點，也見於陳傅良《春秋後傳》，¹¹⁸ 呂、陳二人在「世變」的觀察視角有其交集。

又如《春秋》襄公二十七年，叔孫豹先與晉趙武、楚屈建、蔡公孫歸生、衛石惡、陳孔奐、鄭良霄等會於宋，後又與諸侯之大夫盟於宋。呂大圭屢次從盟會討論伯業更迭及其對華夷勢力消長的影響，而以宋之盟為天下大變：「宋之盟，是天下之大變也。……向也，不過陳、鄭、蔡從楚耳，無他近楚之國也；今也，魯、衛、宋均於事楚矣。自是，再會于虢，至申之會，而蠻夷之君大合十一國之眾，而楚專主諸侯矣。故曰是天下之大變也。」¹¹⁹ 楚國統馭中原的轉折就是宋之會盟，開啟此後華夷勢力消長的新變，此觀點已見於陳傅良《春秋後傳》：「晉、楚初同主諸夏盟也。……以諸侯分為晉、楚之從而交相見也於是始，則是南北二伯也，天下之大變也。於溴梁而無君臣之分，於宋而無夷夏之辨。」¹²⁰ 各國大夫盟會於宋，儼然形成楚、晉南北二伯的局勢，是一天下大變。

必須注意的是，在解經方法上，陳傅良是高舉「《春秋》以一字為褒貶」、「《春秋》之有日例也」，¹²¹ 與呂大圭的學術論調相悖，所以兩方體察麟經世變自然也有不同的切入角度。例如《春秋》文公十四年：「公會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晉趙盾。癸酉，同盟于新城。」《或問》曰：

幽之會，齊桓伯業未盛之時，則其會、其盟也，同出於諸侯之欲，同於懼楚而為此盟也，故書「同」。迨夫齊桓既盛之時，則合海內而聽命於一邦，則有以主是盟者矣，故不書「同」。齊桓既沒之後，晉文起而繼之，諸侯附從之不暇，則亦有以主是盟者矣，故不書「同」。襄公既沒，靈公尚幼，政在大夫，糾合諸侯之力怠矣；楚焰方張，諸侯同懼，於是汲汲焉為新城之盟，而藉晉以為主，非晉之能糾而合之也，故書「同」。是故桓、文未盛之時，是一時也；桓、文既盛之時，是一時

¹¹⁷ 陳傅良著，周夢江點校，《陳傅良先生文集》（杭州：浙江大學出版社，1999），卷 35，〈答賈端老〉，頁 455。

¹¹⁸ 「春秋之初，宋、魯、衛、陳、蔡一黨也，齊、鄭一黨也，鄭有志於叛王而合諸侯。」陳傅良，《春秋後傳》，卷 1，頁 12128。

¹¹⁹ 呂大圭，《春秋或問》，卷 17，頁 192。

¹²⁰ 陳傅良，《春秋後傳》，卷 9，頁 12197。

¹²¹ 同前引，卷 5，頁 12163；卷 2，頁 12135。

也；晉伯已衰之後，是一時也。然則是盟也，其亦幸而諸侯能知汲汲於從晉，而為此盟邪？其亦不幸而晉伯不競，然後諸侯相率以為此盟邪？¹²²

經文書「同」表示諸侯伯業未盛，沒有伯主主盟，如齊桓未盛故莊公十六年書「同盟于幽」、晉靈不競故文公十四年書「同盟于新城」；反之，桓文既盛，力足以糾合諸侯歸附，主持中國盟會，故不書「同」。呂大圭類聚「同盟」經文，勾勒華夏在齊桓之前、桓文之際、晉靈之後的起伏聚散，屬於長時段的觀察，與筆削褒貶無關。但陳傅良同樣關注靈公伯業不競，卻陸續從經文名號褒貶發義：

《春秋》文公九年：公子遂會晉人、宋人、衛人、許人，救鄭。

《後傳》：兵將嘗書大夫，此晉趙盾、宋華耦、衛孔達也，曷為貶稱人？晉遂不競而楚莊伯也。¹²³

《春秋》文公十四年：晉人納捷菑于邾，弗克納。

《後傳》：此晉趙盾以諸侯之師，曷為貶稱人？以晉為不競也。¹²⁴

《春秋》宣公二年：晉人、宋人、衛人、陳人侵鄭。

《後傳》：此晉趙盾用諸侯之師，曷為貶稱人？以晉為甚不競也。¹²⁵

陳、呂二人一樣是將世變中的靈公伯業樁接到麟經的語言現象，但關注的詞彙和判斷卻大相逕庭。陳傅良採名號褒貶，謂晉靈不競故經文書「人」為貶；呂大圭卻主張經文書「人」為略辭：「愚謂經凡稱人者，皆略辭。用兵而非有大役者，皆稱人」、「稱人者，其辭輕；稱爵者，其辭重」，¹²⁶ 屬於達例之常辭，另從書「同」與否判斷齊桓、晉文、晉靈等伯業更迭的升降變化，縱使關注伯主之權的轉移也是按照客觀的爵次排列而發，不會涉及類例褒貶。¹²⁷ 換言之，「理欲」、

¹²² 呂大圭，《春秋或問》，卷 14，頁 159。

¹²³ 陳傅良，《春秋後傳》，卷 6，頁 12171。

¹²⁴ 同前引，頁 12173。

¹²⁵ 同前引，卷 7，頁 12177。

¹²⁶ 呂大圭，《春秋或問》，卷 10，〈莊公三十年〉，頁 109。

¹²⁷ 例如：「城濮之師，序晉侯於齊師、宋師之上，蓋予晉以伯也。曹南之盟，書曰『宋公、曹人、邾人盟于曹南』，則齊桓沒，而伯主之權移於宋也。辰陵之盟，書曰『楚子、陳侯、鄭伯』，則晉文沒，而伯主之權移於楚也。黃池之會，書曰『公會晉侯及吳子于黃池』，則兩伯之辭也。」同前引，卷 8，〈莊公十三年〉，頁 85。

「世變」在宋代社群網絡中是一項議題，呂大圭既受到它們的制約，又試圖透過經典詮釋產生對話效應，足以創造不同的學術議題。¹²⁸ 呂大圭推演《春秋》世變必曾受到陳傅良的啟發，如同胡安國「理欲」對呂大圭亦有具體影響，只是呂大圭基於朱熹「據事直書」，再新立達例、特筆之學術規模，以糅合、匯集眾家之長，成其一家之言。

張立恩認為元儒對統一《春秋》經義多有自覺，首要面對的就是朱熹《春秋》說的理論困境，因此歸納吳澄、程端學「非常而書」，黃澤 (1260-1346)、趙汭 (1319-1369)「由史法以通書法」的解決方案，¹²⁹ 但從上面的分析，可以發現南宋晚期呂大圭就已嘗試這項工作。「達例」與「特筆」這套解經方法既可延續朱熹《春秋》說的基本精神，又可彌縫擴充成更完整的詮釋體系，顯見呂大圭即使步履朱熹的觀點前進，在師法的傳承關係上也不缺少個人的獨立性，尤其是發明朱熹「見世變」，既不會讓詳略、輕重、近遠之書辭僅流於單方面的歧說，更重要是能從「一字褒貶」的根柢重新翻建體系架構，而這在朱學系統中也是獨特的立論。元代《春秋》名家程端學更受呂大圭影響，也反對一字褒貶，「嘗慨《春秋》在諸經中獨未有歸一之說，遍索前代說《春秋》者凡百三十家，沉潛紬繹者二十餘年」，¹³⁰ 著《春秋本義》、《春秋三傳辨疑》、《春秋或問》三書。其中《春秋本義》卷首〈綱領〉又載錄呂大圭《春秋五論》全文，援引的篇幅比重遠勝其他學者；《春秋或問》形式與呂大圭一樣設立自問自答，歷舉諸說得失，表明去取之意。¹³¹ 清儒姚際恆高度評價二書：「崑山新刊《經解》，《春秋》不下二三十種，佳者絕少，略可觀者，呂大奎氏《或問》、程積齋《或問》而已。」¹³² 可見元儒的解決方案前已有南宋學者呂大圭作為啟發與先驅。

¹²⁸ 黃俊傑認為：「經典解釋者就像任何個人一樣地生存於複雜的社會、政治、經濟、歷史文化的網絡之中，他既被這些網絡所制約，又是這些網絡的創造者。」黃俊傑，〈從儒家經典詮釋史觀點論解經者的「歷史性」及其相關問題〉，《臺大歷史學報》，24（臺北：1999），頁8。

¹²⁹ 張立恩主張吳澄、程端學通過詮釋進路的轉換，亦即將「辭→義」轉為「事→義」的詮釋模式，解決朱熹理論的困境；而黃澤、趙汭進一步將史法系統化，歸之於策書之例、筆削八義，以重建聖人之意與經義關聯。張立恩，《元代春秋學研究》（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哲學系博士論文，2018），頁98-205。

¹³⁰ 納蘭性德，《納蘭文·霞蔚》，卷12，〈程積齋春秋序〉，頁138。

¹³¹ 紀昀等，《欽定四庫全書總目》上冊，卷28，〈經部二十八·春秋類三〉，頁356。

¹³² 姚際恆，《春秋通論》，〈春秋論旨〉，頁8。

五、結語

李建軍提到南宋晚期《春秋》學的特色：

南宋後期、晚期的《春秋》學著述，不管是張洽《春秋集注》、呂大圭《春秋五論》、《春秋或問》，黃仲炎《春秋通說》等對朱子《春秋》觀的明顯承繼，抑或魏了翁、黃震對《春秋》及三傳所作的節錄選抄、闡發詮釋，……都不過是踵武前賢而已，都鮮有創新。這說明本期《春秋》學已喪失了理宗朝以前那種不斷出新、屢有創獲的發展勢頭，走向了以承繼歸結為主要特徵的守成時代。¹³³

繼踵前賢、歸結守成確實可視為此時期的學術特色，但本文以呂大圭《春秋五論》、《春秋或問》為研究文本，已可確認呂大圭絕非單純步履前人論述，或是淪為循聲盲從的附屬，他仍是有一套具體的章法理路，在踵繼紹承之上別闢蹊徑。此外，經學家解經會隨著時代的政策、學術、文化等因素而產生變動，南宋晚期各派的學術理念、風氣與發展當然已和之前有別，這對當時學人來說也是一項挑戰。畢竟胡安國、陳傅良、朱熹都是南宋前期、中期的學術主流，聲勢和影響力皆遠高於呂大圭以及其他學者，因此他們面對的課題和解決方案已非「不斷出新、屢有創獲」的創造，而是思考該如何「前修未密，後出轉精」的再造。鍾彩鈞曾提出後人研究應採取的切入角度：「唯有從學術風氣轉變中看到各種豐富的可能性，才能欣賞及評價學者的努力，並使我們能在學術主線已明的後世，再回頭看看當時的旁流或伏線，而得到新的啟發。」¹³⁴ 對應到呂大圭《春秋》學，他在學術風氣轉變的樞紐中也嘗試了折衷統合，為後來元代《春秋》學開啟了新的學術里程，也許呂大圭在南宋時期只能定位為旁流伏線，但對元代樹狀共生的學術流域來說卻是一道重要的活水源流。

（責任校對：吳克毅）

¹³³ 李建軍，《宋代《春秋》學與宋型文化》（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8），頁 78-79。

¹³⁴ 鍾彩鈞，〈宋翔鳳學術及思想概述〉，收入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編委會編，《清代經學國際研討會論文集》（臺北：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籌備處，1994），頁 357。

引用書目

一、傳統文獻

- 王 揆 Wang Shan 等奉敕撰，《欽定春秋傳說彙纂》*Qinding Chunqiu zhuanshuo huizuan*，《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Yingyin Wenyuange siku quanshu* 經部第 173 冊，臺北 Taipei：臺灣商務印書館 Taiwan shangwu yinshuguan，1986。
- 王 弼 Wang Bi、韓康伯 Han Kangbo 注，孔穎達 Kong Yingda 等正義，《周易正義》*Zhouyi zhengyi*，《重刊宋本十三經注疏附校勘記》*Chongkan Songben shisanjing zhushu fu jiaokanji* 第 1 冊，臺北 Taipei：藝文印書館 Yiwen yinshuguan，1982。
- 王先謙 Wang Xianqian 撰，沈嘯寰 Shen Xiaohuan 點校，《莊子集解》*Zhuangzi jijie*，北京 Beijing：中華書局 Zhonghua shuju，1987。
- 司馬光 Sima Guang 撰，李之亮 Li Zhiliang 箋注，《司馬溫公集編年箋注》*Sima Wengong ji biannian jianzhu* 第 3 冊，成都 Chengdu：巴蜀書社 Bashu shushe，2009。
- 皮錫瑞 Pi Xirui 著，周春健 Zhou Chunjian 校注，《經學通論》*Jingxue tonglun*，北京 Beijing：華夏出版社 Huaxia chubanshe，2011。
- 朱 熹 Zhu Xi 撰，朱傑人 Zhu Jieren 等主編，《朱子全書》*Zhuzi quanshu*，上海 Shanghai：上海古籍出版社 Shanghai guji chubanshe；合肥 Hefei：安徽教育出版社 Anhui jiaoyu chubanshe，2002。
- 朱長文 Zhu Changwen 撰，朱思 Zhu Si 輯，《樂圃餘藁》*Lepu yugao*，《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Yingyin Wenyuange siku quanshu* 集部第 1119 冊，臺北 Taipei：臺灣商務印書館 Taiwan shangwu yinshuguan，1986。
- 朱彝尊 Zhu Yizun 撰，林慶彰 Lin Ching-chang 等主編，《經義考新校》*Jingyikao xinjiao* 第 7 冊，上海 Shanghai：上海古籍出版社 Shanghai guji chubanshe，2010。
- 杜 預 Du Yu 注，孔穎達 Kong Yingda 等正義，《春秋左傳正義》*Chunqiu zuozhuan zhengyi*，《重刊宋本十三經注疏附校勘記》*Chongkan Songben shisanjing zhushu fu jiaokanji* 第 6 冊，臺北 Taipei：藝文印書館 Yiwen yinshuguan，1982。
- 呂大圭 Lü Dagui 著，趙宗乙 Zhao Zongyi 點校，《春秋或問》*Chunqiu huowen*，北京 Beijing：商務印書館 Shangwu yinshuguan，2017。

- 李清馥 Li Qingfu, 《閩中理學淵源考》 *Minzhong lixue yuanyuan kao*, 《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 *Yingyin Wenyuange siku quanshu* 史部第 460 冊, 臺北 Taipei: 臺灣商務印書館 Taiwan shangwu yinshuguan, 1986。
- 胡 宏 Hu Hong 著, 吳仁華 Wu Renhua 點校, 《胡宏集》 *Hu Hong ji*, 北京 Beijing: 中華書局 Zhonghua shuju, 1987。
- 胡安國 Hu Anguo 著, 錢偉彊 Qian Weiqiang 點校, 《春秋胡氏傳》 *Chunqiu Hushi zhuan*, 杭州 Hangzhou: 浙江古籍出版社 Zhejiang guji chubanshe, 2010。
- 紀 昀 Ji Yun 等, 《欽定四庫全書總目》 *Qinding siku quanshu zongmu* 上冊, 北京 Beijing: 中華書局 Zhonghua shuju, 1997。
- 姚際恆 Yao Jiheng, 《春秋通論》 *Chunqiu tonglun*, 收入林慶彰 Lin Ching-chang 主編, 《姚際恆著作集》 *Yao Jiheng zhuzuoji* 第 4 冊, 臺北 Taipei: 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 Zhongyang yanjiuyuan Zhongguo wenzhe yanjiusuo, 1994。
- 孫 復 Sun Fu, 《春秋尊王發微》 *Chunqiu zunwang fawei*, 收入徐乾學 Xu Qianxue 輯, 納蘭成德 Nalan Chengde 校訂, 《通志堂經解》 *Tongzhitang jingjie* 第 19 冊, 臺北 Taipei: 漢京文化 Hanjing wenhua, 1985。
- 孫詒讓 Sun Yirang 著, 潘猛補 Pan Mengbu 點校, 《溫州經籍志》 *Wenzhou jingjizhi* 第 1 冊, 北京 Beijing: 中華書局 Zhonghua shuju, 2011。
- 郝 經 Hao Jing, 《陵川集》 *Lingchuan ji*, 《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 *Yingyin Wenyuange siku quanshu* 集部第 1192 冊, 臺北 Taipei: 臺灣商務印書館 Taiwan shangwu yinshuguan, 1986。
- 家鉉翁 Jia Xuanweng, 《春秋集傳詳說》 *Chunqiu jizhuan xiangshuo*, 收入徐乾學 Xu Qianxue 輯, 納蘭成德 Nalan Chengde 校訂, 《通志堂經解》 *Tongzhitang jingjie* 第 24 冊, 臺北 Taipei: 漢京文化 Hanjing wenhua, 1985。
- 納蘭性德 Nalan Xingde 著, 尹小林 Yin Xiaolin 主編, 《納蘭文·霞蔚》 *Nalan wen, Xiawei*, 《納蘭性德全集》 *Nalan Xingde quanji* 第 5 冊, 北京 Beijing: 國際文化出版 Guoji wenhua chuban, 2016。
- 張 耒 Zhang Lei, 《柯山集·附拾遺(七)》 *Keshan ji, fu shiyi 7*, 《叢書集成初編》 *Congshu jicheng chubian* 第 1955 冊, 北京 Beijing: 中華書局 Zhonghua shuju, 1985。
- 張 洽 Zhang Qia, 《春秋集註》 *Chunqiu jizhu*, 收入徐乾學 Xu Qianxue 輯, 納蘭成德 Nalan Chengde 校訂, 《通志堂經解》 *Tongzhitang jingjie* 第 23 冊, 臺北 Taipei: 漢京文化 Hanjing wenhua, 1985。
- 張大亨 Zhang Daheng, 《春秋通訓》 *Chunqiu tongxun*, 《叢書集成初編》 *Congshu jicheng chubian* 第 3646 冊, 北京 Beijing: 中華書局 Zhonghua shuju, 1991。

- 陳傅良 Chen Fuliang, 《春秋後傳》 *Chunqiu houzhuan*, 收入徐乾學 Xu Qianxue 輯, 納蘭成德 Nalan Chengde 校訂, 《通志堂經解》 *Tongzhitang jingjie* 第 21 冊, 臺北 Taipei: 漢京文化 Hanjing wenhua, 1985。
- 陳傅良 Chen Fuliang 著, 周夢江 Zhou Mengjiang 點校, 《陳傅良先生文集》 *Chen Fuliang xiansheng wenji*, 杭州 Hangzhou: 浙江大學出版社 Zhejiang daxue chubanshe, 1999。
- 黃 震 Huang Zhen 著, 張偉 Zhang Wei、何忠禮 He Zhongli 主編, 《黃氏日抄》 *Huangshi richao*, 《黃震全集》 *Huang Zhen quanji* 第 1 冊, 杭州 Hangzhou: 浙江大學出版社 Zhejiang daxue chubanshe, 2013。
- 黃仲炎 Huang Zhongyan, 《春秋通說》 *Chunqiu tongshuo*, 收入徐乾學 Xu Qianxue 輯, 納蘭成德 Nalan Chengde 校訂, 《通志堂經解》 *Tongzhitang jingjie* 第 23 冊, 臺北 Taipei: 漢京文化 Hanjing wenhua, 1985。
- , 《春秋通說》 *Chunqiu tongshuo*, 《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 *Yingyin Wenyuange siku quanshu* 經部第 156 冊, 臺北 Taipei: 臺灣商務印書館 Taiwan shangwu yinshuguan, 1986。
- 黃宗羲 Huang Zongxi 原著, 全祖望 Quan Zuwang 補修, 陳金生 Chen Jinsheng、梁運華 Liang Yunhua 點校, 《宋元學案》 *Song Yuan xue'an*, 北京 Beijing: 中華書局 Zhonghua shuju, 1986。
- 程公說 Cheng Gongyue, 《春秋分記》 *Chunqiu fenji*, 《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 *Yingyin Wenyuange siku quanshu* 經部第 154 冊, 臺北 Taipei: 臺灣商務印書館 Taiwan shangwu yinshuguan, 1986。
- 程端學 Cheng Duanxue, 《春秋本義》 *Chunqiu benyi*, 收入徐乾學 Xu Qianxue 輯, 納蘭成德 Nalan Chengde 校訂, 《通志堂經解》 *Tongzhitang jingjie* 第 25 冊, 臺北 Taipei: 漢京文化 Hanjing wenhua, 1985。
- 樓 鑰 Lou Yue 撰, 顧大朋 Gu Dapeng 點校, 《樓鑰集》 *Lou Yue ji* 第 3 冊, 杭州 Hangzhou: 浙江古籍出版社 Zhejiang guji chubanshe, 2010。
- 歐陽修 Ouyang Xiu 著, 洪本健 Hong Benjian 校箋, 《歐陽修詩文集校箋》 *Ouyang Xiu shiwenji jiaojian* 上冊, 上海 Shanghai: 上海古籍出版社 Shanghai guji chubanshe, 2009。
- 蘇 輿 Su Yu 撰, 鍾哲 Zhong Zhe 點校, 《春秋繁露義證》 *Chunqiu fanlu yizheng*, 北京 Beijing: 中華書局 Zhonghua shuju, 1992。
- 蘇 轍 Su Che, 《春秋集解》 *Chunqiu jijie*, 《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 *Yingyin Wenyuange siku quanshu* 經部第 148 冊, 臺北 Taipei: 臺灣商務印書館 Taiwan shangwu yinshuguan, 1986。

二、近人論著

- 弗朗索瓦·于連 François Jullien 著，杜小真 Du Xiaozhen 譯，《迂迴與進入》*Yuhui yu jinru*，北京 Beijing：三聯書店 Sanlian shudian，1998。
- 向世陵 Xiang Shiling，《理氣性心之間——宋明理學的分系與四系》*Li qi xing xin zhijian: Song Ming lixue de fenxi yu si xi*，北京 Beijing：人民出版社 Renmin chubanshe，2008。
- 李建軍 Li Jianjun，《宋代《春秋》學與宋型文化》*Songdai Chunqiu xue yu Songxing wenhua*，北京 Beijing：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Zhongguo shehui kexue chubanshe，2008。
- 宋鼎宗 Sung Ting-tzung，《春秋宋學發微》*Chunqiu Songxue fawei*，臺北 Taipei：文史哲出版社 Wen shi zhe chubanshe，1986。
- 沈玉成 Shen Yucheng、劉寧 Liu Ning，《春秋左傳學史稿》*Chunqiu zuozhuan xue shigao*，南京 Nanjing：江蘇古籍出版社 Jiangsu guji chubanshe，1992。
- 姜義泰 Chiang Yi-tai，《北宋《春秋》學的詮釋進路》*Beisong Chunqiu xue de quanshi jinlu*，臺北 Taipei：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博士論文 Guoli Taiwan daxue Zhongguo wenxue xi boshi lunwen，2013。doi: 10.6342/NTU.2013.02307
- 姜廣輝 Jiang Guanghui 主編，《中國經學思想史（第三卷）》*Zhongguo jingxue sixiang shi 3* 上冊，北京 Beijing：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Zhongguo shehui kexue chubanshe，2010。
- 張偉 Zhang Wei，《黃震與東發學派》*Huang Zhen yu Dongfa xuepai*，北京 Beijing：人民出版社 Renmin chubanshe，2003。
- 張立恩 Zhang Li'en，《元代春秋學研究》*Yuandai Chunqiu xue yanjiu*，上海 Shanghai：華東師範大學哲學系博士論文 Huadong shifan daxue zhhexuexi boshi lunwen，2018。
- ，〈《春秋》是實錄嗎？——朱子以史視《春秋》說之理論困境及元儒之解決方案〉“*Chunqiu shi shilu ma?: Zhuzi yi shi shi Chunqiu shuo zhi lilun kunjing ji Yuanru zhi jie jue fang'an*”，《北京社會科學》*Beijing shehui kexue*，2，北京 Beijing：2018，頁 115-128。
- 張高評 Chang Kao-ping，《春秋書法與左傳學史》*Chunqiu shufa yu Zuozhuan xue shi*，臺北 Taipei：五南圖書 Wunan tushu，2002。
- ，〈春秋書法與左傳史筆〉*Chunqiu shufa yu Zuozhuan shibi*，臺北 Taipei：里仁書局 Liren shuju，2011。
- 許松源 Shu Sung-yuan，《經義與史論——王夫之《春秋》學研究》*Jingyi yu shilun: Wang Fuzhi Chunqiu xue yanjiu*，新竹 Hsinchu：國立清華大學歷史研究所博士論

- 文 Guoli qinghua daxue lishi yanjiusuo boshi lunwen, 2008。doi: 10.6843/NTHU.2008.00063
- 康凱淋 Kang Kai-lin, 《胡安國《春秋傳》研究》*Hu Anguo Chunqiu zhuan yanjiu*, 臺北 Taipei: 致知學術出版社 Zhizhi xueshu chubanshe, 2014。
- 黃俊傑 Huang Chun-chieh, 〈從儒家經典詮釋史觀點論解經者的「歷史性」及其相關問題〉“Cong Rujia jingdian quanshi shi guandian lun jiejingzhe de ‘lishixing’ ji qi xiangguan wenti”, 《臺大歷史學報》*Taida lishi xuebao*, 24, 臺北 Taipei: 1999, 頁 1-28。doi: 10.6253/ntuhistory.1999.24.01
- 趙伯雄 Zhao Boxiong, 《春秋學史》*Chunqiu xue shi*, 濟南 Jinan: 山東教育出版社 Shandong jiaoyu chubanshe, 2004。
- 蔡方鹿 Cai Fanglu, 《朱熹經學與中國經學》*Zhu Xi jingxue yu Zhongguo jingxue*, 北京 Beijing: 人民出版社 Renmin chubanshe, 2004。
- 劉國民 Liu Guomin, 〈論《公羊傳》對《春秋》的解釋〉“Lun Gongyangzhuan dui Chunqiu de jieshi”, 《湖北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 *Hubei daxue xuebao (zhexue shehui kexue ban)*, 3, 武漢 Wuhan: 2005, 頁 338-341。
- 劉德明 Liu De-ming, 〈吳澄《春秋纂言》中的「屬辭比事」探析〉“Wu Cheng Chunqiu zuanyan zhong de ‘zhuci bishi’ tanxi”, 《國文學報》*Guowen xuebao*, 61, 臺北 Taipei: 2017, 頁 95-125。doi: 10.6239/BOC.201706.04
- 戴 維 Dai Wei, 《春秋學史》*Chunqiu xue shi*, 長沙 Changsha: 湖南教育出版社 Hunan jiaoyu chubanshe, 2004。
- 鍾彩鈞 Chung Tsai-chun, 〈宋翔鳳學術及思想概述〉“Song Xiangfeng xueshu ji sixiang gaishu”, 收入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編委會 Zhongyang yanjiuyuan Zhongguo wenzhe yanjiusuo bianweihui 編, 《清代經學國際研討會論文集》*Qingdai jingxue guoji yantaohui lunwenji*, 臺北 Taipei: 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籌備處 Zhongyang yanjiuyuan Zhongguo wenzhe yanjiusuo choubuichu, 1994, 頁 353-381。

The Exegetical Method Used in Lü Dagui's Studies of the *Chunqiu*

Kang Kai-lin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Fu Jen Catholic University
095666@gapp.fju.edu.tw

ABSTRACT

This article analyzes Lü Dagui's 呂大圭 (1227-1275) conclusion that the compositional techniques of consistent terminology and unique expression were used to make differences in the *Chunqiu*'s 春秋 original categories become universal. Following this line of thought leads to an understanding of the flow of worldly change in the text. In addition, the fact that specificity is selected from universality, and that ethical principles are derived from unique expressions, proves not only that Confucius established right and wrong as well as good and evil through his composition of the *Chunqiu*, but also that he used the text to define heavenly principle and the human mind. Lü's interpretative methodology continued many of Zhu Xi's 朱熹 (1130-1200) basic ideas regarding the text, and established a balance between the general and the unique that integrated theories from other schools. In terms of continuation and succession, Lü can be said to have developed a new approach, which he expanded into a more complete interpretative system, and which served as an important forerunner of the "compromise and unity" school of the Yuan dynasty.

Key words: Lü Dagui 呂大圭, Zhu Xi 朱熹, the *Chunqiu* 春秋, principle and desire, worldly change

Méthode exégétique dans *Chunqiu wu lun* et *Chunqiu huowen* de Lü Dagui

L'article analyse la thèse de Lü Dagui 呂大圭 (1227-1275), selon laquelle les techniques d'écriture de terminologie uniforme et d'expression unique étaient employées afin que les différences des catégories originales du *Chunqiu* 春秋 deviennent universelles. Cette ligne de pensée nous amène à suivre le flux du changement du monde dans le texte. La méthode exégétique de Lü permettait d'hériter des idées fondamentales de Zhu Xi 朱熹 (1130-1200) vis-à-vis du *Chunqiu*, et d'établir une harmonie entre le général et l'unique qui intégraient des théories d'autres écoles. En matière de continuité et de succession, on peut dire que Lü a fondé une nouvelle approche, qu'il amplifiait pour en faire un système interprétatif plus complet et qui est devenu le pionnier de l'école de « compromis et unité » de l'époque Yuan.

Mots clés : Lü Dagui 呂大圭, Zhu Xi 朱熹, *Chunqiu* 春秋, ordre naturel et désire, changement du monde

達例と特筆

——呂大圭『春秋五論』、『春秋或問』の解釈方法

本文は、呂大圭 (1227-1275) が『春秋』の筆法を改めて達例の常辞、特筆の変文と論断して、元々の類例における相違性が普遍性に変わり、そして、これに従って『春秋』の世変の流れに通じていったことを分析している。この経典を解釈する方法は、朱熹 (1130-1200) の『春秋』説の基本精神を延續することができ、別に達例と特筆で調和して、各派の学説を混合させ、諸説をわかりやすく説き、諸家を比較してその特徴を明瞭にして、南宋の諸学に通じる学問を実践する。そして、前人の学説を受け継ぎ、さらに新しいものを創造し、修正し拡充しながら、一層完璧な解釈体系を整え、元朝の『春秋』学を折衷して統一した先駆となったのである。

キーワード : 呂大圭、朱熹、『春秋』、理欲、世変

Lü Daguis exegetische Methode in der Analyse des *Chunqiu*

Dieser Artikel analysiert Lü Daguis 呂大圭 (1227-1275) Auffassung, dass eine Kompositionstechnik bestehend aus konsistenter Terminologie und eindeutigen Ausdrücken in der Interpretation des *Chunqiu* 春秋 verwendet wurde, um die heterogene Originalterminologie des Textes zu vereinheitlichen und universal verständlich zu machen und um Veränderungen in herrschender Weltsicht zu reflektieren. Lüs interpretative Methode setzte viele der ursprünglichen Ideen Zhu Xis 朱熹 (1130-1200) fort und etablierte, Theorien anderer Schulen integrierend, eine Balance zwischen dem Allgemeinen und dem Einmaligen. Aus der Perspektive von Kontinuation und Nachfolge entwickelte Lü einen neuen Ansatz, welchen er zu einem vollständigen interpretativen System ausweitete, das als wichtiger Vorläufer der ‚Ausgleich und Einheit‘ Schule der Yuanzeit gilt.

Key Wörter: Lü Dagui 呂大圭, Zhu Xi 朱熹, *Chunqiu* 春秋, Prinzipien und Sehnsüchte, Veränderung von Weltsicht

(收稿日期：2020. 3. 2；修正稿日期：2020. 9. 1；通過刊登日期：2020. 9. 29)

